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2009年11月，頁169-220

中共建政後
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49-1976)*

鍾延麟**

周恩來與鄧小平作為中共黨國重要的領導人，長時一起參與中共的重大決策、政策以及事件。然而，有關中共建政後的周、鄧兩人關係議題，迄今仍欠缺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在文獻分析並輔以訪談的基礎上，本文認為：周恩來、鄧小平雖已相識多年，對對方經歷與特質也有深度認識，但是兩人的政治關係，在中共建政後不同時期的發展與變化，最主要受到毛澤東主導的政治格局的影響與制約。

在毛的扶植下，鄧的權位從1950年代中期急遽竄升；周卻因「反冒進」問題遭毛批判。毛在發動「大躍進」時，降低周在經濟事務上的地位，卻改

---

* 本文乃基於：鍾延麟，「文革前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56-1966)」，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天津南開大學和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2008年4月20-21日。然而，本文除將原有的研究時間範圍加以延伸擴展，也增補多筆資料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批判材料與新近出版的文獻。另外，也利用作者在中國大陸所做的訪談所得，以作為必要的補充。為了不造成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文中乃以甲、乙、丙、丁的代號名之。最後，作者要特別感謝華東師範大學的沈志華教授、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莫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孫萬國教授曾對本文初稿的惠予指導與評論。本文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要鄧擔負此一新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執行者的角色，在毛的安排下，更出現鄧之中央書記處領導周之國務院的情況。直至1966年「文革」以前的周鄧關係，皆在此新職權框架下發展。在「文革」之前，政策上，周、鄧戮力推行毛澤東激進的內、外政策主張，但兩人因共同經手處理「大躍進」後的危局，彼此政治傾向逐漸趨近、較為務實；往來上，周知鄧為毛所器重之人，對之看好也願予支持；鄧對周一向尊重，重視其所提意見。「文革」開始後，鄧遭毛離棄，周在政治上唯能與之劃清，兩人關係因而中斷、停滯。林彪倒臺後，毛決定再次起用鄧，周既促成鄧的政治復出，更助其在「文革」激進派環伺下順利立足。此時期周、鄧因目標一致與共同政敵明確而關係緊密，雖然兩人面對政治挑戰的策略有別。兩人關係將屆尾聲時，周病入膏肓，鄧也因操之過急觸怒毛而失寵，未幾即第二次被打倒。值得一提的是，周鄧關係在受毛因素影響的同時，在不同時期也不免受到當時其他實力派人物的影響。

周鄧關係的歷史意義與作用方面，「文革」前兩人保持信任、相互協調的關係，有助中共高層政治的穩定，這先後表現在：對高崗問題的順利解決；「大躍進」前後高層政治的權力分配雖有變化(主要表現在周、鄧之間)，但仍穩健運行鮮有摩擦，其負面後果是兩人配合以奉行毛的偏差政策主張。「文革」中，兩人互相扶持、縝密合作的關係，既一度有效抑制激進派別的得勢，也有力地集結了對運動有所疑慮的力量，這對於「極左」人士在毛身故後不久即慘遭清洗，立下了重要的基礎。

最後，對於毛以外的中共領導人彼此間之平行關係的研究視角與議題方向，本文亦有開展性的意義。

關鍵詞：周恩來、鄧小平、毛澤東、中共黨史、中共高層政治

一、前言

周恩來與鄧小平自遊歐留法起就結識對方，回國後亦曾在上海並肩從事地下工作，兩人互動往來甚多。[1]中共建政後不久，鄧小平自西南上調北京，又與周恩來一起在中央工作直至「文革」爆發鄧被迫離職。「文革」後期，鄧小平一度復出政壇，周、鄧二人又再行合作直到周離世為止。鄧小平晚年即曾表示，在 1930 年代與之同旅法國的諸多中共人士中，周恩來與之關係最為密切，「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2]

在兩人共事、相處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中，周恩來與鄧小平在中共建政後，亦即在所謂「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的關係，乃相當值得關注與研究。首先，此一時期所具的承先啟後的意義。周、鄧自早期以降所積累的對彼此的認識與信任，到了 1950 年代已臻成熟，並可適切地轉化、表現在之後雙方的工作與往來上。周、鄧在這一時期內的密切配合與協作，以及其間所生成的更進一步的了解與熟悉，自是兩人在 1970 年代前半期攜手與共的關鍵因素。

其次，此一時期周、鄧二人的職務地位與政治影響。周恩來在中共開國後即膺任政府總理，至死方休，在黨內也常居於「坐三望二」的位置；鄧小平除了自 1952 年起擔任副總理，1956 年中共「八大」以後，鄧小平更獲任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央總書記。易言之，周、鄧同是斯時中共黨國的主要領導人，亦即皆身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之列。周、鄧有較為寬闊的政治舞台，施展自身統領黨國的理念與本領，而兩人作為之舉足輕重、舉止之風行草偃，更是他們在中共創業過程中侷限一地的影響力所不能相比的。

再次，無論是研究周恩來或是鄧小平的學者中，雖都曾不約而同地指出：欲更深入地認識周恩來與鄧小平，將兩者進行交叉比較，乃屬必要。[3]然

---

[1]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臺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97-98，145，151-152，159-161。

[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頁97。

[3] 例如：已故學者李天民曾指出：「為認識周恩來，從環繞和交叉比較毛、劉、鄧去看，可能更

而，現有的關於周或鄧的專著或文獻，對此皆無系統而深度的探究。本文觀察中共建政後周、鄧兩人的關係與互動，就是這種比較研究的嘗試。

本文的主要論點為：中共建政後，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政治關係的發展與變化，主要受到毛澤東的影響與制約。「文革」前，特別是「大躍進」發動前後，在毛「抑周抬鄧」下，兩人相對的權力關係，出現周消鄧長的情形。然而，周、鄧之間在「文革」前所保持的彼此往來信任、工作協調的關係，有助於中共高層政治與人事的穩定和諧。「文革」中，尤其是鄧復出政治、施行整頓期間，周在政治上全力支持鄧。兩人目標一致、縝密合作的關係，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在於適時壓制「極左」勢力，為後來「文革」的結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本文的目的在於：試圖勾勒出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在中共建政後的往來梗要與相處情形，冀以對中共早期的高層政治、領導人際關係，以及黨政運作的認識有所裨益。文內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概有六個部份：一、中共建政初期的周鄧關係；二、在「大躍進」開始前後，兩人職權關係的調整；三、周、鄧在「文革」前中共重大政策上的協作；四、周、鄧在「文革」前政治實際運作與彼此往來的情形；五、「文革」時期的周鄧關係。最後，在結論的部份，則對本文試行的聚焦毛澤東以外的其他中共領導人之互動關係的研究視角，作一簡單的討論。

二、中共建政初期之周鄧關係(1949-1956)

周恩來在中共建政至 1956 年中共「八大」以前這段期間，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中次於毛澤東、劉少奇而位列第三。周恩來是「黨中央的第三書記而後分工主管政府工作」，亦及同時作為政務院總理。其「不僅要溝通、體現

真實、更深遠。」李天民，《評周恩來》(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頁242。中國大陸關於鄧小平研究的文章，也提出將鄧小平與周恩來作比較的需要。李紅喜，〈十年總書記期間鄧小平的思想與實踐研究述評〉，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研究述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上冊，頁224。

黨中央對政府工作的領導，而且還要參與黨中央對全局工作的集體領導。」[4]鄧小平與劉伯承領兵「二野」進兵大西南後，即坐鎮當地，官拜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

周恩來與鄧小平此時雖分居北京與四川，各忙其職，但是周對鄧的欣賞與重視仍不時流露。例如：1950 年 6 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周恩來曾主動對薄一波評價鄧小平的工作方法，表示其自身對鄧之「舉重若輕」尤爲欣賞，並自承「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5] 1951 年 10 月，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三次會議召開，周恩來指示政務院邀集列席政協會議的各省市政府負責人座談或列席。周恩來在講話中，爲了向與會者說明中央與地方往來聯繫的重要性時表示：鄧小平同志這次來京開會曾說，「上下通氣是我們革命隊伍的優良傳統」。[6]這反映出周恩來對鄧相關觀點與說法的贊同，不吝對來自各地的高級幹部加以宣傳，其也實質上爲居於一方之鄧小平的個人名聲起到宣揚的效果。

爲因應黨國事務的鋪展並加強中央領導的需要，未幾中共中央決定上調各方有力人士至北京協助。作爲方面大員的鄧小平，即是所謂「五馬進京」之其中一員。而其之入京，正是經由周恩來的建議。1952 年 7 月 10 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及其他中央書記處書記。其中，周建議：鄧小平擔任副總理，並於 8 月來京主持一段時間的政務院工作。由於需才若渴，同日，毛澤東即批示同意。[7] 7 月 13 日，劉少奇撰寫電報(經毛加寫文字)給鄧小平：「望小平將西南工作佈置後於 7 月下旬即來中央一商，並在中央先行工作兩三個月。

---

[4] 吳群敢，〈為了中華之崛起〉，收入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42。

[5] 周恩來對薄一波表示，根據其多年觀察，鄧小平、劉伯承的工作方法分別是「舉重若輕」與「舉輕若重」。周表示：「從願望上說，我更欣賞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在話，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是同我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郭思敏、天羽編，《我眼中的鄧小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147-148。

[6] 馬永順，《周恩來組建與管理政府實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245。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上卷，頁247-248。

何時可以動身，盼告。」8 月 7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小平爲政務院副總理。[8] 8 月 13 日，周恩來在政務院會議上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訪問期間，由鄧小平代理總理職務。」[9]如此可見，初到政務院的鄧小平即被委以重任。鄧也不失所望地儘快將工作上手，襄助周恩來的工作。例如：同年，爲制定針對幹部的正式獎懲法規，根據周恩來指示的精神，作爲副手的鄧小平審核簽發《關於國家工作人員行政處分批准程序的通知》。[10]

周恩來對於鄧小平能赴京協助中共中央料理政務，是期待並賦予厚望的。鄧小平到任後首次到訪周恩來辦公所在地西花廳時，周在向鄧介紹相關情況，還曾略帶幽默地對鄧表示：「你筆頭又快，主席一定很快就會賞識你的。」[11]周恩來對鄧小平才幹的了解，不可謂不深。因爲僅過半年的 1953 年 3 月 3 日，毛澤東在一文件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12]

此後不久，在中共高層對「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發生歧異的背景下，政情緊繃。周恩來在工作上因有瑕疵倍受壓力，處境頗爲困難；相形之下，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則受毛澤東重用，被授以經濟大權。高崗其後更藉機起事，掀起政治風波。對此，鄧小平在 1980 年 3 月 19 日曾回顧：

> 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作者按：毛澤東)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作者按：周恩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

---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卷4，頁328-330。

9 龐松，〈1952-1956年鄧小平的工作、思想軌跡〉，收入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鄧小平百週年紀念——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1836。

10 馬永順，《周恩來組建與管理政府實錄》，頁195。

11 吳群敢，〈在西花廳周總理身邊工作〉，《中共黨史資料》，總第63期(北京，1997.09)，頁100。

12 此一文件為鄧小平為中共中央代擬的同意政務院監察委員會1953年上半年工作要點的覆文稿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關於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請鄧小平多管一些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冊4，頁72-73。

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頭暈轉向。[13]

在所謂「高饒事件」(饒為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過程中，高崗曾利用稅制政策的問題，以批評主事的財政部長薄一波的方式，藉以同時爲難政務院之首周恩來。鄧小平在毛澤東的示意下對相關爭執予以適度的解套。鄧小平就事論事的言行，在客觀上紓解了周、薄當時所承受的政治壓力。[14]鄧小平在高崗從事非組織活動，特別是向他進行政治遊說以一同拱倒劉少奇時，其所表現出的警覺守紀和秉公不阿——向毛澤東告發，促之採取作爲處理高崗問題，成爲「高饒事件」急轉直下的轉捩點。其間有一細節或可顯現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特殊的政治交情。

根據 1986 年 8 月 30 日楊尚昆有關中共黨史問題的談話，其表示：高崗找鄧小平政治遊說後，「小平就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就跟毛主席說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厲害。」[15]此說如無訛誤，可以顯示鄧小平與周恩來之間的信任非同一般。因爲向毛澤東揭發權傾一時的高崗，本非易事，既要政治膽識，更要謹慎、明智的政治判斷。當時作爲中共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書記處的成員，除了毛以外，尚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以及陳雲等人。鄧不找劉報告，主因劉乃是高首要扳倒的對象，鄧若直接告知劉有關高的不法行徑，容易讓人(特別是毛)覺得鄧是在劉、高兩人之間的糾葛中選邊，恐自損其向黨中央告發高崗的正當性。鄧不找朱德通報，乃因朱對相關情況不清楚，甚至曾呼應高崗主張的在毛請假請間，由書記處成員輪流主持中央工作(也就是改變行之多年的由劉代理的辦法)。至於剩下的兩名書記，陳雲在西北、東北多與高崗接觸，應知其不少底細，鄧若與陳交換看法，理可獲得對高不軌行徑更確實的看法。然而，依楊尚昆的說法，鄧卻有意識地選擇先告知周

---

13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261-262。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修訂本)上卷，頁251。

15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第3期(北京，2009.06)，頁35。

恩來，周也如實將問題向毛呈報。兩人之間若無長時交往與了解、對高崗問題沒有共同的認識，恐難以爲之。

因爲周、鄧如此交心以對，乃須共同擔負極大的政治風險。高崗上調中央後，如前所述地，甚受毛澤東的器重；毛後來雖漸因高舉止過於冒失(例如：政治鬥爭上不知策略，與黨軍實權人物過度靠近)而對高有所狐疑，但是未必到了要下定決心翦除高的地步。周、鄧(再加上陳雲)向毛指陳高崗的不是，實際上也是向毛提出嚴肅處理高政治問題的要求。毛澤東不能再對高崗對劉少奇一再的權力進逼(毛曾或明或暗地慫恿高)，繼續裝作推諉不知；[16]毛縱使對高仍懷有同情，也只能無奈地「揮淚斬馬謖」。[17]

周鄧關係在「高饒事件」前後的發展，「第三者因素」——高崗的影響，自是甚大。周、鄧各自在面對政治上異軍突起、狀似不顛覆毛以下的權力現狀不罷休的高崗時，皆有加強彼此關係的利基。對周而言，毛在充實中央領導陣容一事上，高與鄧皆爲其首選。然而，魯莽、張揚、權力慾外顯的高崗，不但有害於「朝中」和諧，對周自己的權位更直接造成威脅。周與鄧已有一定的關係與認識，再加上鄧行事低調，與之較好相處。鄧欲揭發高，本有利於周本人，助鄧向毛告發高，更有益於將來的周、鄧共事。對鄧而言，其與高崗約莫同時調入中共中央，但高在政治上卻「一馬當先」，有一枝獨秀之姿。已是瞠乎其後的鄧，恐不樂見高再進一步地取代劉少奇、周恩來的位置，何況高採用的是引人非議的權謀手法。高找鄧遊說倒劉一事，乃犯政治大忌，鄧有周之助，更可加重倒高的砝碼，也可順勢爲周解決大患，自己日後也可多獲周的照顧。經此一事，周、鄧彼此間的信任與關係，確實是益加增強。

「高饒事件」中的周鄧關係，對中共黨史發展的影響與意義在於：讓中共建政後高層的第一起政治鬥爭，以平穩的、引起較小震盪的方式解決並落

---

[16]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640.

[17] 林蘊暉，《國史劄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頁146-147。

幕。周、鄧合作促使中共中央對高崗那種不講組織紀律、赤裸從事權力交易的不正之風加以揭露與批判，也實有以正視聽、端正中共高層政風的作用。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的表現，甚獲各方激賞，尤其是毛澤東本人對之再次刮目相看，如此反映在鄧小平黨內地位於短時內的屢獲拔升。鑑於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青睞，以及周恩來本身對鄧素質、能力的了解，周對鄧政治地位與權力竄升的安排，不但欣然接受，也配合支持，即便這可能是實同對其本身權力的分蝕。周恩來就曾表示：「小平年富力強，手頭又快，要讓他多幹一些。」[18]

1954 年春，中共中央設置中央秘書長會議制度。4 月 27 日，鄧小平被任命爲中央秘書長兼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秘書長職務與其主持之會議，主在協助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研究、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此一較具秘書處性質的制度，即兩年後中共「八大」成立的中央書記處的雛形。[19]由於該職常常開會，幾乎每天都召開秘書長會議，並且是上午 9 點、午後 3 點接連開會，故有「九三學社」之戲稱。[20]這也適足反映鄧小平的忙碌。鄧小平的工作重心，自也更多地置於黨的方面。

1954 年 10 月底，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進行國務院領導的分工，其中，除林彪養病外，另一未分配工作的副總理即是鄧小平，正因其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之故。[21]鄧小平雖減少對國務院事務的參與，然而，周恩來仍然很重視鄧在國務院領導工作中的地位。例如：1955 年 10 月，周恩來指示：在國務院常務會議開會中，有關中央書記處會議與毛澤東的重要決定、指示的傳達問題，由周本人、陳雲，以及鄧小平負責。[22]

中共在 1956 年「八大」決定成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取代先前的

---

18 孫岳，〈我給周總理當機要秘書〉，收入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頁169。

19 李林，〈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7.09)，頁15-16。

20 龐松，〈1952-1956年鄧小平的工作、思想軌跡〉，頁1844。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423。

22 馬永順，《周恩來組建與管理政府實錄》，頁152。

中央書記處，將其與政治局並置爲中央的最高決策機關。然而，有異於此前集最高決策和領導中央日常工作兩者合一的制度，中共中央另外成立一中央書記處，在政治局與常委會領導下負責處理黨中央日常工作，並設立中央總書記一職領導之。

中共中央設置中央書記處與中央總書記的目的，既旨在減輕常委會主要成員的工作負擔，使之得以從大量的繁瑣工作中抽身出來，將心力轉移至重大政治方針與戰略問題的思考。也是試行「一線」、「二線」領導的安排，並從中培養、磨練後進幹部，以助其積累經驗並樹立威信。當然，也存在對既有權力狀態重新予以調整的可能。如此重要的職務，鄧小平雀屏中選。其本人惶恐地自覺「不行」、「不順」，毛澤東特地爲此在黨內要人之前爲之宣傳、美言。[23]

在毛澤東的以壯聲勢之下，鄧小平在中共官僚體系中的平步青雲，確實引起各界的關注。例如：針對鄧小平在中共「八大」新領導團隊中的地位，當時山東濟南市的機關幹部中即有反應鄧「進步很快」、「提拔得很快」；河南民主人士中議論最多的是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結果，尤其是對周恩來得票比鄧小平少，都感到驚訝。[24]

然而，周恩來並未因此妒嫉或感到威脅，相反地，周恩來對鄧小平的新職在行動上予以肯定。據作爲中央書記處一員的李雪峰回憶：「書記處成立後第一次召開會議時，周恩來同志參加了，小平同志請他主持會議，周恩來同志一再說他不宜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會議，結果由小平同志主持，以後都是如此。」[25]這顯示：周恩來雖在中共「八大」後任黨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也較諸鄧小平在前，但是爲了表示對鄧小平中央總書記職權的尊重，而認爲宜由

---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521。

24 〈山東、河南、天津、武漢等地機關幹部和民主人士對「八大」的反映〉，《內部參考》，總第2015期(北京，1956.10.10)，頁853-854。

25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221。

鄧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這也從一個側面既顯現周恩來對鄧小平的支持與愛護，也體現周個人對看排場、講形式的官場文化，淡然視之的行事風格。另外，周恩來甚至主動地要求由其領導之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如地質部副部長，向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26]

毛澤東在「八大」準備期間曾半開玩笑地表示：周恩來、陳雲及鄧小平是「登臺唱主角」的「少壯派」。然而，在經歷 1956 年「反冒進」、1957 年整風、「反右派」，以及反「反冒進」後，周、鄧兩人之間的職權關係，重新經過調整。

三、周、鄧職權關係之調整(1957-1958)

約在 1956 年，周恩來在一次接受韓素音(Han Suyin)訪問時曾表示：「你以爲在黨內就沒分歧。共產黨是鐵板一塊，這是一個在西方甚爲普遍的主觀看法…。如果你知道我們是怎麼辯論、討論與爭論…。我們常常持以非常不同的意見。」韓注意到當周恩來論及此點時，「在他的聲音中帶有著引人注意的激動情緒」。[27]周恩來此刻可能多少是有感而發，因爲值此前後，他正在試圖克服壓力著手進行「反冒進」的工作。

1956 年地方響應毛澤東加快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號召，激起擴大投資的聲浪，中共中央內部對此出現看法上的歧異。毛澤東主張追加當年基本建設預算，周恩來除了在正式會議上反對最力，據胡喬木回憶，周更在會後對毛表示：「我作爲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28]毛雖感不快，但一時隱忍未發。周恩來則繼續推行重均衡、講穩健的發展方針與政策。如此卻種下來年底起周恩來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機。

鄧小平斯時雖然精力並不放在經濟建設問題上，但其對周恩來主導下的

---

[26] 何長工，〈周總理對新中國地質工作的關懷〉，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86。

[27] Dick Wilson, *Zhou Enlai*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4), 207.

[28]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356。

「反冒進」相關主張是認同的。例如：1957 年 3 月，鄧小平在山西針對當時國內供需緊張表示，其問題根源在於「經驗不足，一股熱心，建設搞快了，產生了錯誤。但這是前進中的錯誤」。[29]

同年 4 月，鄧小平在西安幹部會議上作報告亦指出：

> 過去幾年，我們的建設成績是很大的…。但同時也要看到，建設中暴露出來的嚴重缺點，特別是最近一兩年來，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主要是教條主義傾向，是值得引起我們嚴重注意的。比如在我們同志的頭腦中，對建設總是貪新貪大，這種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的思想使我們吃了虧。[30]

但是周恩來與鄧小平傾向「反冒進」的立場，卻因爾後情勢的發展而難以持續，特別是 1957 年「反右派」的加溫，形成不利於「反冒進」者的政治氣氛。1956 年的「反冒進」與 1957 年的整風運動，二者原先同是作爲穩定當時中國大陸國內政經情勢的設計和安排，但隨著整風運動變質爲「反右派」，與「右派」若干主張和言論近似的「反冒進」政策，在批判「右派」聲調日漸拉高的情況下，政治上陷於進退維谷的局面。[31]其相關主張者的困局，更在毛澤東對「反冒進」愈加表現出不耐時急遽惡化。毛澤東從 1957 年下半年起一連在數次中共高層會議上高調抨擊先前「反冒進」的政策和相關主事者，周恩來因此承受極大的政治壓力。

周恩來自認其「反冒進」主張的初衷與構想，乃更符合實際狀況與現實所需，輕易放棄，不但其難以理解，更有違己責；但是面對從上而來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嚴厲聲討，其若負隅抗拒，則又有影響黨內高層團結之虞。相權之下，周恩來選擇的是「相忍爲黨」，接受批評並開展自我檢討。面對此

---

[29] 胡富國，〈山西人民永遠懷念小平同志〉，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頁74-76。

[30] 鄧小平，〈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卷1，頁264-265。

[31]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93-95.

一煎熬，向來對政治起伏不形於色的周恩來，其所受的苦楚、壓抑與不快，身邊工作人員也能有所感受。周恩來甚至曾在漫漫長夜裏以酒澆愁。[32]

相較於周恩來成爲毛澤東反「反冒進」首當其衝的對象，鄧小平則在此一過程的前後，益受毛澤東的重用，進而在其推動的「大躍進」戰略與政策中扮演擔綱演出的角色。首先，1957 年春中共發起整風運動，其後突轉爲浩浩蕩蕩的「反右派」鬥爭，至隔年仍方興未艾。相形於周恩來在相關運動中，所曾可能出現的被動；[33]鄧小平作爲中央總書記，稟承上意雷厲風行地執行此一政治運動。[34]毛澤東對此頗感滿意。

其次，毛澤東反「反冒進」，主要係針對當時國務院主持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此前因多聚焦於黨務，雖傾向「反冒進」主張，但畢竟涉入不多，因而不是毛澤東點名批判的對象。在中共政治的政策形成過程中，掌握、洞悉毛澤東本人的意旨乃至關重要，及早而準確地表態既有助自身政治地位的安全，更能獲得毛的賞賜和晉升。[35]在毛個人對經濟發展戰略的喜惡，已是呼之欲出的情況下，鄧小平必須有更積極的表態：一方面，藉此向毛表示他已毅然決然地拋棄原先傾向「反冒進」的立場；另一方面，對毛帶領下的新經濟建設方針宣示效忠。鄧小平在 1958 年初的成都會議上的發言，

---

32 周秉德，鐵竹偉執筆，《我的伯父周恩來》(香港：滿威利基金會，2007，第五版)，頁259，278-279。

33 有論者指出：對中共自身進行整風的需要性與迫切感，周恩來較諸其他主要領導人，乃心意真切、積極主動。然而，自中共邀請黨外協助整風後，周恩來不久即在一定程度上陷於尷尬的處境。因為作為周下屬的國務院若干黨外閣員，以及周平素的統戰重點，亦即與之多有接觸的民主人士，對中共所行以膽大、深刻的發言，招致黨內極大的反彈，這不免轉嫁成對周的壓力。Dick Wilson, *Zhou Enlai*, 213-214. 另外，周恩來曾過問一些運動中的具體案子，例如：反對將葉恭綽(時任臺灣外交部長的葉公超為其侄，周憂會對之造成影響)、吳祖光、蕭乾等劃為「右派」，但最後卻都不成功。可見周對相關政治運動影響力的有限。夏衍，〈終身難忘的記憶〉；蕭乾，〈兩次見到總理〉，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頁289，293-294。

34 鍾延麟，〈鄧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4期(臺北，2007.12)，頁87-116。鄧小平晚年對此也坦言不諱：「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鄧小平，〈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41。

35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2-53.

可說是一個代表。

鄧小平在會上批判「反冒進」，說其成因就是「思想裡面有不好的根子」，「思想根源就是主觀主義，其表現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比較兩者，鄧強調要注意克服經驗主義。因爲「老幹部比較多，大家都是老資格，而且又確實有一些經驗」，「不能很虛心地去學習別人的先進東西，故步自封起來」，「散佈的範圍比較廣」。鄧更指出：「對經驗主義的錯誤絕不應輕視，要正視它的頑固性。」對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鄧小平表示：「對社會主義一定要有宏圖，要有『好大喜功』」，「現在我們的方向是明確的，只要我們有幹勁，那就一定可以把我們的社會主義搞快，也就不會犯機會主義的錯誤。」[36]

鄧小平對於當時因「反冒進」問題而受批的周恩來，持以何種態度呢？前述的鄧小平對「反冒進」的批判，表面上雖是針對一種普遍的思想傾向而不是針對個別人，但是由於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就被當作是黨內經驗主義錯誤的代表(周當時就自承是「經驗宗派的代表」)，[37]此次又是「反冒進」的領頭者，鄧小平在反「反冒進」時高聲批判經驗主義，可說是以一種較委婉的方式，呼應毛澤東在此議題上對周恩來的敲打。[38]

以鄧小平對周恩來對中共事業忠誠與認真的了解，鄧沒有乘人之危地對周施以「牆倒眾人推」的惡意行徑。相反地，鄧小平力能所及地減緩周恩來所承受的責難和壓力。周恩來針對其「反冒進」問題所痛苦書寫的檢討報告，曾送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傳閱。鄧小平既爲常委、又是書記處之首，自也過目此一檢討。鄧小平閱後表示：「寫這麼多幹什麼？」鄧除將一些字句加以修改，使之含意較爲減輕外，他甚至將毛澤東批判周恩來時所用的「離右派五十米遠」等字句直接刪去。[39]

---

36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陶鑄傳達紀錄)〉，收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1967)，頁22-23。

37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提綱，1943年11月15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78。

38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表示：鄧小平是「批(路)線不批(個)人」。另一名黨史研究者(乙君)也表示：鄧小平並無如劉少奇那樣地對周恩來個人進行嚴厲的批評。

39 童小鵬，《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下冊，頁516。鄧小平修改周恩

1958 年 5 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後，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周恩來此舉，並非「以退爲進」的政治策略之計，而係其早先主導的「反冒進」，既然已遭全面地批判，出於對政治責任的承擔與不回避，自認已不再適合擔負閣揆之職。周恩來辭意頗爲堅決，可從其曾囑咐其身邊機要人員，將其個人用書與總理辦公室用書分開管理看出。[40]1958 年 6 月 9 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相關問題(與此同時也討論彭德懷所提不擔任國防部長的要求)。鄧小平在會後撰寫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紀要」，其中指出會議決定「他們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鄧並將此紀要報送毛澤東。[41]鄧小平將會議討論結果轉化爲書面文字並加以備案，其含有在程序上再次確認周恩來的總理職位的用意。這也有助於闢除當時甚囂塵上的柯慶施(中共在華東的領導人，其因踴躍支持毛澤東的「大躍進」計畫而為毛所公開褒揚)將取代周恩來出任總理的謠傳。

早期西方學者雖注意到歷經「反冒進」等挫折的周恩來，其原本兼任的外交部長一職由陳毅取代，但是卻認爲周只是失去面子但無損其權威。[42]然而，實際上，卻非如此簡單。周恩來實質的政治地位大受衝擊，並主要表現在其領導的國務院和中央總書記治下的中央書記處之間的關係，有了重大而實質的調整。

來檢討報告之字句一舉，在政治上確實含有特殊的政治意義，並適以反映兩人關係的非同一般。這可從比照鄧小平在1955年毛澤東因農業合作化問題批判鄧子恢及其領導的中央農業工作部時的不同態度上觀察。毛當時對鄧子恢的不滿形諸於色，鄧小平不但對外完整地傳達毛所言的「鄧子恢這種思想，靠他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砲轟」的批評，自己也加入對鄧子恢的批評，上綱上線地言其對「合作化」的動搖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更在審閱中央農工部秘書長杜潤生的檢討報告時批示「這般批評是不夠的」並加重其政治責任，終而迫其調職，致使鄧子恢在工作上失去得力的左右手。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58-62。然而，1958年毛是在中央高層會議上公然語帶威脅地直接批周「離右派五十米遠」，鄧竟在審閱周的檢討報告時，將此高層人士皆知是毛所言的話刪掉，的確需要政治勇氣。鄧的相關修改紀錄，也會伴隨該檢討報告的傳閱而最終為毛所知曉。鄧或有意用這種間接方式向毛表示：周即便有錯，也罪不至與右派相近的地步。

40 孫岳，〈我給周總理當機要秘書〉，頁162。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下卷，頁1396。

42 Dick Wilson, *Zhou Enlai*, 216.

1958 年 5 月 25 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之前任職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事務的李富春、李先念，被選入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央書記處，「以便把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的一些問題提到書記處討論」。[43]此一人事調動，無異將國務院先前主導經濟工作的權力，移轉至中央書記處。另外，在毛澤東的倡議下，6 月 10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其中，毛澤東加寫：

> 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44]

按以上的安排，在推行政治局決定的大政方針上，中央書記處負責「具體部署」，國務院及其黨組擔負的是「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中央書記處的位階乃位於國務院之上，後者雖有建議權，但必須聽命於前者，亦即按之部署加以執行。中央各小組的建立，使得國務院的各項領域的工作，依業務性質歸口受其管制、協調；中央各小組統一集中聽命於黨中央，實質上又是與常設性質的中央書記處作直接聯繫並受其指揮。經此設計，中央書記處得以將國務院更緊密地附著於其下。

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之間經調整後新定位的上下關係，雖然不能直接看成是周恩來與鄧小平個人之間新的權力關係(在黨內，周的地位至少在形式上仍居鄧之上)，但在此一格局下，彼此權力一消一長的態勢是相當明確的。[45]正由於

---

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頁1396。

44 毛澤東對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1958年6月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頁1396。

45 前述的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以「鄧領導周」概括兩人的新權力關係。另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指出：在「文革」前的中共政治中，所謂的「一線」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體制」，周恩來實質的權力地位，尚在此三人之後。

政治權力不小幅度的轉移，周恩來辦公的西花廳，難免不若先前的車水馬龍而略顯冷清。[46]

四、周、鄧在「文革」前重大政策中之協作(1958-1966)

在 1958 年「大躍進」蓄勢待發之際的職權調整後，周恩來與鄧小平的政策協作，先後表現在「大躍進」與對其結果的檢討與整治，以及中共的外事關係。

兩人在主張「以鋼爲綱」之「大躍進」的協作上，即可從鋼鐵生產作觀察。在大煉鋼鐵問題上，有關鋼鐵生產目標上，毫無疑問，毛澤東享有一槌定音的地位。然而，鄧小平與其下的中央書記處在估計目標設想和方案選擇與調整時，乃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可在 1958 年底到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幾次壓縮鋼鐵指標的過程中看出：1958 年 11 月下旬的武昌會議中，毛澤東針對 1959 年鋼產 3000 萬噸的目標表示：「要不要那麼多」、「能不能搞那麼多」的疑問時，鄧小平立即響應表示「值得考慮」，支持並堅定毛澤東降低指標的想法。1959 年 3 月下旬上海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鄧小平提出要再降低該年的鋼鐵指標，強調「把計劃定在確實可靠的基礎上，寧肯超過，大家心情舒暢一點」。其意見爲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所接受，促成鋼的指標又進一步下調至 1800 萬噸(1650 萬噸為好鋼)。5 月下旬，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更提出：「工業方面來個解放思想，1800 萬噸鋼既然辦不到，索性來個精神解放」，不然，「眼睛只看到 1800 萬噸，就會把全面丟掉，包括丟掉人心。」中共中央將 1959 年鋼產指標從原先的 3000 萬噸，到廬山會議前降至於 1300 萬噸，鄧小平的影響不可謂小。[47]

按照新的組織關係與權責分配，鄧小平主要是「抓大放小」，周恩來雖

---

[46] 據周恩來侄女回憶：「我當時一點不知道南寧會議伯伯挨批的事，只是隱約覺得西花廳少了往日那種人來車往的繁忙，多了些冷清。」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頁244。

[47] 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為〉，《當代中國研究》，第93期(普林斯頓，2006.06)，頁101-102。

同是與聞「抓大」，但是更多地費心力於「抓小」。根據當時任職冶金部的官員的回憶：相較於鄧小平在相關問題上的「熱後方醒」，[48]「總理的頭腦是冷靜的」。[49]周恩來除了曾技巧地對毛澤東、鄧小平對煉鋼的看法加以引領，在將鋼鐵必成目標的具體落實上，他更是實際的張羅、組織與統籌者。周的經濟秘書就回憶：「總理雖然不同意，但中央指標他得執行，而且每週開一次鋼鐵匯報會，自己也參加大煉鋼鐵。」[50]全國各地每天都要向西花廳報送相關鋼鐵生產的報表。據其身邊工作人員的追憶，周恩來對這些「戰果」特別關注，要求每天更新報上來的數字，以讓之迅速掌握全國狀況。[51]周恩來「舉輕若重」的工作風格在此表露無遺。

1960 年，中共與蘇聯賭氣，誓言煉「爭氣鋼」，如同前兩年的作法，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在是年秋冬又頻發「狠抓鋼鐵生產」的通令，指定日產鋼量，動員各級限時完成任務。此時正忙於中蘇兩黨談判事務的鄧小平，深知相關鋼鐵指標若「跳票」，定會影響其與蘇方代表唇槍舌戰時的「底氣」。鄧小平在 10 月 10 日敕令李富春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召集冶金部、煤炭部、鐵道部負責人，就實踐鋼鐵指標問題進行討論。據與會者回憶，「會議氣氛非常緊張」，因時間緊迫，周恩來在會上大發雷霆，要求有關部會一定要完成任務。[52]會後，負責「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工作的周恩來，又召集相關各部部長開會，「動員大家完成這個鋼產量的指標」。[53]

實事求是地，即便中共領導人在運動開始後不久就已感覺到鋼鐵指標過高的問題，但也僅停留在「熱中有冷」、但求「糾而不泄」的程度。鄧小平

---

48 袁寶華回憶：「小平同志一開始也是贊同『大躍進』的，但是看到實際工作中出現了許多問題，他的頭腦也最早開始冷靜下來。」賀耀敏，〈鄧小平領導我們進行整頓和改革——訪袁寶華同志(上)〉，《百年潮》，第8期(北京，2004)，頁5。

49 袁寶華，〈國家每出一件事就揪著他的心〉，收入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頁146。

50 顧明，〈不受浮誇風左右〉，收入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頁153。

51 趙煒，冷風執筆，《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32-33。

52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301-302。

53 袁寶華，〈國家每出一件事就揪著他的心〉，頁146。

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猶是懷有「雄心壯志」，仍對「主觀能動性」有所執著。有心表現者也極力爭取其的支持與認可。然而，中央書記處批可並納之爲目標後，兌現、執行的難題又要落到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及相關部門的肩膀上。對此，周恩來確實處於相當爲難的境地。[54]他不是不知情實踐的難度，但是又得堅決執行，並盡可能地對之不打折扣。陳雲後來即以「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到總理那兒講困難」，批評這種現象。[55]

赫魯雪夫曾評論：「我可以看出周恩來自身認爲這整件事情是非常愚笨的，但是他對此沒辦法做任何事情。『大躍進』不是他的想法。」[56]恐爲赫氏所不能體會的是，周恩來堅強的黨性，更促使他無怨地埋首於他不見得認同的政策。正基於對周政治人格認識的不足(相關資訊嚴重稀缺，致使主觀臆測成為無可避免)，西方的媒體與研究者，甚至一度錯誤地揣測：周恩來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之前，暗中串連以朱德、彭德懷爲首的軍方，試圖對抗毛澤東、劉少奇一派；周並可能取毛而代之。[57]

「大躍進」政策對當時中國大陸所造成的立即而嚴重的災害，已眾所周知。[58]作爲總書記的鄧小平與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大躍進」中應負的責任問題，既可見鄧小平與其他中央書記處成員所做的檢討，也可從鄧小平後來在不同時、地所作的回顧得悉。例如：1961 年 3 月 19 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小組會上以中央書記處之名作自我批評：

> 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缺點，中央應當負擔主要責任。57 年以後，中央的具體工作由書記處主持，作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工作沒有做好，日常工作做得不壞，但方針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鋼鐵的

---

54 周恩來的保健醫生曾聽周抱怨過，有些部門領導人為了迎合上級，慷慨地作出了不切實際的承諾，但隨即又訴苦，表示不能辦到，使他十分為難。卞志強，〈永恆的光輝，不盡的思念〉，收入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頁464。

55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06。

56 Dick Wilson, *Zhou Enlai*, 219.

57 Dick Wilson, *Zhou Enlai*, 218.

58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8).

第二本帳，糧食數量、公社規模等，我們都參加了意見，贊成了的。[59]

至於鄧小平個人對運動偏差的涉入問題，一方面，可從在中央書記處內協助鄧「負總責」的彭真在 1962 年的講話看出。彭真指出：「1960 年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大出口，基本建設也是 1960 年搞得最多。1960 年的毛病出在沒有調查研究，首先是我們書記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60]另一方面，也不乏鄧小平事後自己所做的檢討與省思。例如：有關「大躍進」期間惡名昭彰的高估產、高徵購問題，鄧小平在 1968 年曾對此表示：「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每年徵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我作爲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61]1980 年代，鄧小平在白首憶往時也說自己當年「頭腦也熱」、「沒有反對」。

無須諱言地，周恩來在「大躍進」相關爭議性政策上也有一定的干係。縱使對此一戰略與決策，其有不得不接受的苦衷，也帶有意見上的保留。但周恩來也「組織紀律強」地投入，努力將之付諸執行與兌現。當然，不能忽視或否認周在其中曾盡其所能地拉近浮想連翩的運動目標與仍處窮白的中國實際之間的鴻溝。然而，在運動難以爲繼之時，周恩來不爲自身先前所受委屈訴苦，也不藉機算帳、叫板，反而基於其所認知的黨的「大局」，甘於、甚至是過度於爲上、爲其同僚分攤責任。

中共在 1962 年初召開旨在檢討「三面紅旗」政策得失的「七千人大會」。國外有關周恩來的傳記與研究，論及周恩來在該會議的表現，多僅側重周在會上以爭攬責任的方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62]然而，卻無注意到周在代表國務院並對其自身進行檢討之時，實際上也爲總書記鄧小平及其領銜的中央書記處，起到減輕其應負責任的作用。

---

59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南、華北小組會上的講話紀錄，1961年3月19日。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95。

60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07。

61 鄧小平，〈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摘錄)〉，1968年6月20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62 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1.

如前所述，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在「三面紅旗」高舉之時，其職權被規限在「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以及「檢查之權」。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雖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操之於「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央書記處)。易言之，周恩來雖擔任黨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與委員，但是其主要職司於落實最高層峰與領導集體的意旨，而不擔負「抬頭看路」的問題。事實上，其在「埋頭拉車」的過程中，又更多的是銜命於負責「具體部署」、常以中央名義拍板定案的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1962 年 2 月 7 日，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卻主動地挺身爲之分扛責任。周表示：

> 對於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國家計畫和具體政策、具體措施，有許多是由政府部門提請中央審核批准的。還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沒有經過中央審核批准，就由各部門擅自發出，這更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分散主義行為。計畫上的高估產、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大、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都是有責任的。[63]

另外，周恩來在同一講話中，當談到糧食問題，其表示「爲了保證國家最低的需要」，「徵購數字也不能再減少」，爲強調此一問題的嚴重性，他在數千名中共各級幹部面前，特地引述鄧小平的話，其表示：「鄧小平同志說過，如果再減少，那只好解散城市，大家回鄉。」[64]期以讓在座者透過鄧小平的強硬表態，知曉黨中央爲相關使命必達所下的決心。這也讓聽眾產生黨總書記的話語莫可小覷、必須正視的觀感。這在中央書記處及其負責人針對「大躍進」問題在不同範圍內一再檢討，且確實已有人對中央書記處在運動中的表現有所怨言之際，[65]無疑是一種悉心的緩頰與照應。綜上所述，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既維護毛澤東顏面，也對鄧小平在黨的各級官僚中的

---

[63]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95。

[64]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219。

[65] 例如：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認為，錯誤的責任應主要歸咎於中央，尤其是中央書記處，並對其的檢討不甚滿意，認為「不深刻」。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71。

權威加以撐扶。

其後，爲讓中國大陸儘早步出「三面紅旗」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西方一本流傳甚廣的周恩來傳記指出：代表中共中央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與鄧小平，試圖改革中國的經濟、政治以更貼近中國當時的實際。他們的作法首重追求經濟的復甦與效能，相對地，他倆不過於擔心其可能對黨既往的一些意識形態綱領可能形成的衝擊。周恩來卻謹慎地不使其自身與相關改革過於緊密，並時而提醒他們要注意一些理應堅持的理想。[66]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一方面，鄧小平經過一陣對虛無目標的盲目追逐後，確實難能可貴地重拾理性思維與務實態度；另一方面，周恩來與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中共領導人，則想方設法將中國大陸的情勢轉危爲安。在面對一些敏感的意識形態議題如：知識份子的定位問題，周恩來更有其堅持與勇氣。周恩來偕同陳毅「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份子之冕」。然而，周的相關觀點與提法，在黨內卻遭到質疑與挑戰。統管黨中央各部的總書記鄧小平，毅然表態支持周恩來。[67]只可惜因無獲毛澤東認可，而使得相關調整最終不了了之。

另有論者指出，在「文革」爆發前幾年，鄧小平已察覺：毛澤東雖讓包括鄧在內的所謂「一線」領導人治理國家，但是對後者卻越來越不滿意。鄧小平逐漸體認到毛澤東左傾偏好的不切實際，但是他了解在政策管理上不滿足毛所欲，則又易讓自己陷入危險。鄧小平便採取低姿態的方式因應，索性託付其副手彭真理事而自己借機避開政治漩渦。[68]對於鄧小平退作「甩手掌櫃」，平素與鄧在工作上多有接觸的觀察敏銳的周恩來，也不免稍有怨言。[69]只不過，鄧小平相關作爲豈能躲過心細如髮的毛澤東，毛後來說「鄧小平對

---

66 Dick Wilson, *Zhou Enlai*, 228.

6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40-1041。

68 Frederick C. Teiwes, “Mao and His Lieutenant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20 (1988), 68-72.

69 有資料顯示：1964年周恩來曾抱怨：「現在辦事情太困難了。黨的事情只有彭真在管，軍隊全靠羅瑞卿，政府只有我。這麼大的國家，就這麼三個人管具體的事，別的人都只是說說，不做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1994)，頁422。

我是敬而遠之」，[70]指的正是鄧刻意減少直接與毛接觸的意圖和策略。

這一段時期，周恩來、鄧小平在中共對外政策上，特別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保持緊密而呼應的協作關係。中共當時對外關係中的「重中之重」——中、蘇共兩黨關係，正從合作的「兄弟黨」同盟逐漸惡化，甚至演變成雙方公開在報刊上不惜筆墨地指責對方「離經叛道」。在此過程中，周恩來與鄧小平皆全程參與。

後領導人史達林、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交手。鄧小平晚年自言其當年在中蘇共關係中扮演的「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七下莫斯科」就是其在相關議題上甚爲活躍的代表性說法。由於周恩來、鄧小平對外各自向來以柔軟謙合與堅剛果敢的形象著稱，無怪乎時人有一種「毛澤東欲與蘇講和，即派周恩來出面；毛澤東欲對蘇強硬，則遣鄧小平上陣」的說法。事實上，周恩來、鄧小平之間未必有此分工。因爲周出訪時，雙邊也曾不歡而散；鄧出馬時，亦有兩造暫時達成協定的情形。但確實未聞兩人在有關外事議題上曾出現不一致的情況。事實上，在毛澤東對中共對外政策大權獨攬之下，周、鄧只能小心翼翼地致力完成毛指定的任務。

與此相關地，由於中共當時「以我劃線」，對於搖擺在中、蘇共之間、務求爭取兩位「老大哥」之助以成其統一南方志業的北越領導人，頗感不悅。周恩來與鄧小平曾代表中共，連袂出手對越方行以「批評但不撕破臉，施壓而不吵過頭」的任務。[71]

五、「文革」前周、鄧在政治運作與往來上之互動情形

這一時期，在彼此皆有心照應對方之下，周恩來與鄧小平在實際的黨政運作過程中互動甚爲順利。

---

70 〈在中央政治局彙報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收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毛澤東思想萬歲》(臺北，1974)，頁661-662。

71 鍾延麟，〈鄧小平在文革前中共與東南亞共黨之關係：角色和活動〉，《中國大陸研究》，第3期(2006.09)，頁155-157。

(一)周恩來方面

經歷黨內鬥爭無數的周恩來，對於權力傾斜的方向極爲敏銳，也經常旁觀、目睹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賞識與器重。例如：1959 年周恩來偕同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赫魯雪夫與新任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毛在此次會見中向蘇方介紹中共的政治局委員，當他介紹到鄧小平時表示：「不要小看他個子小，他是中國政壇上正在升起的一顆明星。」[72]周恩來因此深爲知曉鄧小平在毛澤東心目中與屬意下於黨內的地位，進而「愛屋及烏」對之甚爲看重。

1960 年 2 月，周恩來到廣東從化組織讀書小組。2 月 25 日，周恩來在報告其學習心得時表示：「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後貫穿起來看。至於整理毛澤東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這樣的黨的領導人來總結。」[73]易言之，周恩來將鄧小平視爲未來可代表中共中央歸納、闡述作爲黨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此外，王力曾在周恩來面前針對周與其他主要領導人的關係作過比喻：「總理……自己總是第二提琴手，總是尊重和配合第一提琴手。就像恩格斯常說的，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自己總是第二提琴手。總理不但對主席是這樣，就是對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也是這樣。」據王力回憶：「總理很欣賞我的說法。」[74]可見周恩來在輔佐毛澤東、劉少奇的同時，也很欣然作爲鄧小平的「第二提琴手」，與之琴瑟共聲。

值得一說的是，在 1960 年代前半期，因毛澤東曾公開聲明劉少奇爲其身後的接班人，再加上劉率領其他「一線」領導人成功地整治「大躍進」後的經濟危局，他在黨內的聲望愈加高漲，作爲毛後的中共最高領袖的地位，更顯名符其實，周恩來、鄧小平自也作如是看。因此，此時期周鄧關係的發展，雖主要受制於毛澤東因素，自不免也摻入「第三者因素」—劉少奇。

---

[72] 利沙特·沙拉夫特季諾維奇，〈他是中國不可侵害的一部份〉，收入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頁408。

[7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頁1537。

[74]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上卷，頁360。

對周恩來而言，其主要會考量劉如何看待鄧小平，以及俟劉主政後其在政治上會將鄧置於何種地位的問題。從當時種種跡象來看，劉或是出於毛對鄧的偏愛，以及自身對鄧才幹的欣賞，劉也支持鄧在政治上可高度自主地行使大權。[75]在中共中、高層幹部中也傳出將來劉若繼毛大位之後，其會更進一步地重用鄧的風聲。周恩來鑑於鄧在劉當家作主後可能有的似錦前程，維繫周鄧關係的良好，乃有其必要性。周、劉之間在中共蝸居延安時期，即因劉助毛壓周而有結怨。[76]周若與鄧一直保持不錯的關係，將來劉若要再對之爲難時，多少要顧及同周有一定關係的鄧的態度。對鄧小平而言，若能與一向和劉保有微妙距離的周相好，將來鄧在與毛後的新主劉少奇相處時，倘使劉對他有所不滿而要加以對付、甚至處置時，也會因鄧周關係不錯而多分忌憚。綜上而言，長期作爲中共「二把手」的劉少奇，或也曾間接、無形地對「文革」前周鄧關係的發展有所助長。

1964、65 年之交，毛澤東開始醞釀更換劉少奇作爲其接班人的地位，鄧小平成爲接替的主要人選。1965 年秋，周恩來受毛澤東委託向王稼祥「打招呼」，表示「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77]由於鄧小平作爲毛澤東交班的可能對象之一，周恩來自是不遺餘力地加以相扶，只因「文革」風暴的潛伏與不久後的爆發，使中共中央人事佈局出現重大的震盪。

經世面、閱人事無數的周恩來，以其多年與鄧小平認識與相處的經驗，其對鄧小平的政治思想、行事能力的深度了解，在黨內，除毛澤東以外，恐無人可出其左右。從識人、愛才的角度，其對鄧個人自是厚愛有加，未受論資排輩觀念而影響，也不對後者倚老賣老。

---

75 對於「文革」前劉少奇與鄧小平的相處情形，劉妻王光美回憶：「他們合作得很好。書記處能組理的問題，就書記處處理，書記處解決不了的問題，重大的問題就上報少奇。少奇把重大的決定報告主席。」王光美，〈王光美談鄧小平〉，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56。

7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28。

77 朱仲麗，《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4)卷3，頁763。

首先，周恩來在中共黨、政高級幹部面前，一有機會即爲鄧小平樹立威信，在言行上處處以鄧爲尊。

例如：1959 年因彭德懷上書而導致情勢丕變的廬山會議，鄧小平因腿骨折而無法與會。會議期間，7 月 21 日，周恩來在廬山召開國務院各部長匯報會時，針對落實指標的問題，即曾表示：「過去總書記下決心，現在總書記不在，我們要分勞。」[78]周對斯時人不在廬山的鄧小平的尊重，意在言中。1965 年 5 月 11 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討論當年基建計畫和預算的調整時，有關相關投資的控制，周恩來表示：「控制權，我在家時就經過我送書記處批，我不在時直接找小平同志批。」[79]其顯示：周恩來在相關問題上，自我定位爲先行爲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把關」、「考核」；如其本人不在，由鄧直接議決即可。

1966 年 3 月 5 日，周恩來參加由鄧小平主持之討論改善華北農業落後問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鄧要求在 10 年改變北方農業落後的面貌，其強調：「10 年我們能活著就要爲此而奮鬥。」同日下午，周恩來接續參加北方 8 省市自治區彙報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會議精神。周向與會者表示：「小平同志給了我們 10 年期限，如『三五』期間不打仗，我們就可以實現初步要求。」[80]5 天以後的中共中央華北局會議上，在講到同一問題時，周恩來再次強調：「小平同志說要抓它 5 年到 10 年，我抓主要是幫助。」[81]作爲閣揆的周恩來，公然以輔弼之姿對待鄧小平，周治下的各部百官莫敢不依，對鄧小平的信從，更是只增不減。

其次，周恩來爲鄧小平善行領導工作創造條件，並傾囊相授地協助鄧小平治黨、理政。

周恩來減輕兼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在國務院的工作量，讓鄧心無旁騖地專職於中央總書記的工作，使之得以從全局的高度，施行領導而不過於糾纏於

---

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頁1475。

7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頁1804。

8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頁1817-1818。

8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頁1824。

具體業務。例如：1959 年 5 月 13 日，周恩來約集其麾下副總理座談並安排分工時，即決定鄧小平不分管國務院的經常工作。4 天以後，爲了對當時各地鋼鐵生產情況與問題，有一更全面的了解，周恩來向中央書記處建議，其自身與 8 位副總理分別赴 9 個產鐵重點地區進行視察。其中，即無鄧小平。[82]約此同時，周恩來致信鄧小平並中央書記處，向後者報告並說明國務院內部運作與該院同黨中央上下互動的安排。換言之，周恩來更多地是將鄧小平看作是黨的中央總書記而非其在國務院的副座。其後，在周恩來出訪或請假時，周恩來雖請鄧小平以副總理身分代理總理，但也細心安排李富春負責國務院的日常工作，讓鄧小平不致分太多心思於焉。[83]

周恩來對鄧小平工作的具體支持，除了盡其所能地分攤工作，[84]周恩來也不重表面職務高低，主動向鄧小平進行匯報、尋求請示，甚至曾有過鄧小平在高幹休息俱樂部打橋牌時，周恩來前來找鄧小平商量公事的情況。[85]周恩來有時將重要的問題或待議事項提請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討論、審批，周恩來也經常親自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討論。例如：1958 年 10 月 14 日，周恩來先聽取北京市委的意見，又和有關負責人反覆研究，初步決定採用北京市規劃局提出的人民大會堂的綜合方案，並且同其他國慶工程方案一同做成模型，報請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討論審定。11 月初，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審查通過了國慶工程的各個方案。12 月初，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

---

8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頁1456-1459。

83 例如：1963年12月5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宣佈，在其出訪阿聯、阿爾及利亞等國期間，由鄧小平副總理代理總理；國務院的日常工作李富春副總理負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98-599。另外，1966年1月23日，周恩來致信鄧小平、彭真、李富春：「今午將去天津治手病，凡有關外交、國防緊急事件送小平批辦，國務院日常請示件由富春處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

84 據當年任總理辦公室幹事、秘書趙茂峰回憶：周恩來「從來不嫌工作多，從來不說事情難。他能批的，就自己批，能辦的，就自己辦，凡需要送其他領導同志的，就批送其他領導同志，需要請示報告毛主席、黨中央批的，就說明情況，提出意見或建議，送毛主席、黨中央批。」其中，趙所指的「領導同志」與「黨中央」，應也包括鄧小平。趙茂峰，〈懷念總理，學習總理〉，收入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頁513。

85 王大明口述，汪文慶、劉一丁整理，〈牌友鄧小平〉，《百年潮》，第4期(北京，2009.11)，頁32。

會議，正式討論通過了國慶工程各個方案。[86]另一例可見：1965 年 3 月 21 日，周恩來就《國防工辦關於一、二線省、市、自治區後方建設規劃的報告》，提請鄧小平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並邀請有關同志參加，「定出幾條界線，防止各地在建設中不斷加碼」。[87]

在共同議事過程中，周恩來還會對鄧小平開一些不失敏感的政治玩笑。例如：1960 年代初，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其他成員都反對的情況下，仍堅持自己不擔任人大主席團成員，其他人也莫可奈何。對此，一旁的周恩來還對鄧笑稱：「你不要搞獨裁呵！」[88]由此可見彼此在密切工作互動中的熟稔相識與深厚情誼。

綜上所述，有論者即曾適切地指出：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掌握黨的中央樞紐」。「他的抬頭，是由毛澤東的提攜，劉少奇的扶持，和周恩來的愛護。」[89]

(二)鄧小平方面

中共「八大」後，由鄧小平領銜的中央書記處，「什麼事都要管」、「抓全面工作」，其工作的涵蓋面含括了黨、政、軍各方面，並以「中央名義」行之。如前所述，在「大躍進」緊鑼密鼓階段，又擴增經濟決策權。中共中央書記處因爲經手各方事務，日理萬機，作爲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相當地繁忙，工作量極重。鄧小平妻子卓琳，在鄧出任總書記後，充任鄧的秘書。據

---

86 沈勃，〈描繪首都城市建設的藍圖〉，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周恩來與北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2。

8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719。

88 1960年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旨在協商人大、政協召開大會事宜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彭真介紹說：「人大主席團名單中鄧小平的名字他自己去掉了，書記處全體同志都不同意，但他還是拿掉了。」周恩來對鄧小平開玩笑說：「你不要搞獨裁呵！」鄧說：「不參加主席團照樣領導嘛！」徐萌山，〈溫馨的友誼——記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與我們台胞的交往〉，收入本書編委會編，《肝膽相照見真情——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民主人士的交往》(北京：中國文獻出版社，1999)，頁433。

89 李天民，《評周恩來》，頁252。

卓回憶：「當時中央領導數他的文件最多」。[90]其之忙碌由此可見一斑。鄧小平「每天有很長的時間，都是在辦公室裏度過」。鄧小平當時「身體狀況還相當地不錯」，[91]但是因工作繁重，「過度疲勞使得他患頭痛病。」[92]對於 10 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這段經歷，鄧小平自己後來嘗言：「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個時候。」[93]

司掌「具體部署」的黨總書記工作如此負重，領導「具體執行與細節決策」的政府總理，其之負荷就更令人難以想像了。周恩來對工作的無比投入與無悔付出，乃是跨越地域、甚至意識形態而舉世稱道的。臺灣早期的一本周恩來傳記，即曾以「勤政自束」形容之。[94]1980 年 1 月 16 日，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說：「努力學習周恩來等同志的榜樣，在艱苦創業方面起模範作用」。同年 8 月，鄧小平在答覆義大利記者提問時也表示：「周總理一生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 12 小時，有時在 16 小時以上，一生如此。」鄧小平的相關評論，必有一部份是基於其擔任中央總書記時與周恩來往來的親身經歷。事實上，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所幸有以「大管家」著稱的周恩來的無私襄助，否則工作恐將更爲吃重。

鄧小平晚年曾表示，如他自己與周恩來在內的「早期共產黨員的特點」，在於「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沒有那些觀念，就是幹革命。」[95]作爲黨內高層「後起之秀」的鄧小平，也確實並未因己「搏扶搖而直上」而輕慢向來視爲自身革命兄長的周恩來。鄧小平對周恩來的尊重，可見於當中央書記處討論涉及國務院的工作時，因爲周恩來要參加，所以總是就著周方便的時間開

---

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永遠的小平：卓琳等人訪談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31。

91 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頁276-277。

92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頁231-232。

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23。

94 李天民，《評周恩來》，頁203。

95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頁111-112。

會。[96]這就是一種對周恩來尊敬的表現，並且是對其過度操勞工作的體諒。

鄧小平曾評論周恩來「辦事細」。[97]這是只抓大事的鄧自知不及之處。他對於周恩來所提的意見和主張相當重視，並經常以周的看法作定奪。相關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1963 年 3 月 1 日，周恩來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就糧食、精簡、集市貿易、節約等問題發表意見。鄧小平總結發言說：「以上問題，按總理意見，具體解決。」[98]1963 年 10 月 1 日，周恩來對中聯部報告中提出將國慶期間兄弟黨發來賀電、賀信按左、中、右各派區分的做法，表示異議並認爲「反易授人以柄」。鄧小平批示中聯部：「即照總理意見辦理。」[99]1965 年 12 月 24 日，周恩來致信鄧小平、李富春，針對羅瑞卿問題提出傳達範圍的建議。鄧小平於同日批：「由李質忠(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同志轉告各單位，照總理意見辦理。」[100]

毛澤東曾評鄧小平「不專權」，鄧小平也自認「不擅權」。鄧小平會否擔心周恩來利用其豐富的治理經驗與鄧對之的仰賴而藉此反向引導、進而架空中央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具體部署」的權力？西方有論者指出：中共領導層中，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許多要人，出與對周恩來過去的教導、建議或提拔的敬佩與感激，對於周懷抱敬崇之心。[101]鄧小平當時對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敬重，也爲其子女所注意。鄧樸方回憶：「我們了解的就是當時父親和母親談起總理來的時候，都非常尊敬。父親談到總理的時候，他那種神態呀，都是一種非常尊敬的神態、非常親密。」[102]正是鄧小平對周恩來的熟識，使他相信即便周恩來掌有嫻熟政治過程、統轄各級官僚的實權，也不會牟利圖己，更不會謀私害公。鄧小平曾在「文革」伊始時指出：「恩來同志從不打

---

96 李海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來及職權〉，《黨史博覽》，第9期(開封，2006.09)，頁6。

9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42。

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537。

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583。

1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769-770。

101 Dick Wilson, *Zhou Enlai*, 298.

102 鄧樸方，〈二十世紀真正的知己〉，收入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頁102-103。

自己的旗幟，不搞圈圈、攤攤，全黨高級幹部要學習他的這一作風。」[103]「恩來同志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不斷講(周恩來插話：也還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個人野心，不搞個人主義，不打自己的旗幟，我看總是可以跌倒了爬起來，慢慢地跟上。」[104]

鄧小平的長子曾對鄧小平自 1952 年上調北京任職到「文革」前的 14 年的周鄧關係作出如下評論：

> 作為父親(鄧小平)來說，一直都是非常尊重總理的，總理對父親我覺得也是另眼看待的。特別是後來父親作了總書記，父親就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總理就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這時候，中央一攤工作，國務院一攤工作，合作得是最好的。他們倆互相信任，也互相理解，每個人思考問題的方式、性格、處理問題的辦法不同，互相卻很默契。父親處理事情比較果斷，他是小事不管，大事他抓一抓。總理是主持外事，外事無小事，處理得非常細緻，這兩個人合作得非常好。有時候我們遇到其他的一些老同志，他們都講起，這一段中央和政府間之間的工作關係是非常默契的。儘管當時有毛主席、劉少奇他們在上面，但是在具體工作上，從來沒有聽說有過什麼衝突，直到現在也沒發現過隔閡，一直沒有，非常密切。[105]

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時期，周恩來與鄧小平在私下也有不錯的互動，其主要表現在兩家人的親密互動。因爲鄧穎超與鄧小平同姓之故，鄧小平的女兒回憶：「有一段時間家長們曾讓我們叫她(鄧穎超)姑媽，由此可見父母親與他們的親情。」[106]個人不喜歡串門子、對其舊屬登門造訪也表現得不甚熱絡

---

[103] 石仲泉，〈周恩來——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又一歷史偉人〉，收入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周恩來百週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上冊，頁81。

[104]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5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78。

[105] 鄧樸方，〈二十世紀真正的知己〉，頁102。

[106]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頁98。

的鄧小平，[107]也曾在過年時攜家帶眷地前去周恩來處拜年。[108]這種親近的革命同志之誼，雖不必然會對各自的政治觀點造成影響，但是確能助於雙方從比較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對方，最起碼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誤會，以及因隔閡而產生的不信任感。另外，以周、鄧兩人多年從政經驗以及對黨組織紀律的了解，周、鄧雖然在公餘之時偶有同樂，但也是「群而不黨」，尚不致讓他人生有「派系」之惡感。

從 1958 年周、鄧職權關係調整到「文革」前這一時期的周鄧關係，對中共黨史發展的影響與意義主要在於：毛澤東在「大躍進」醞釀前後展露獨斷的領導風格，與其經濟發展思維迥異的周恩來與陳雲，成爲其開刀、立威的對象，周的實際權力龜縮爲執行與行政權。毛或要使周難堪，竟要長期以來權位都在周之下的鄧小平指導由周指揮的國務院工作。然而，周、鄧個人間的互動，在此新權力佈局與職能安排下，卻無明顯的波動。

鄧小平沒有像數年之前的高崗，在毛批評劉少奇與周恩來的同時，委交其重權就忘乎所以，意想「更上一層樓」；鄧也無因周受毛責罵、羞辱在黨內高層孤寂而改變其原先對之的態度，對周敬重如昔，繼續仰賴周的勤敏才幹與豐厚經驗。周恩來也沒有因鄧小平在權勢上的後來居上、甚至凌駕超前而心生妒意、尋機滋事；周除待鄧爲當前現實政治的實權人物，更視之爲中共未來重要主舵領袖人選之一。周、鄧二人在政治與工作上的和融相處，不但直接使得中共高層政治與人事問題，不因周、鄧之間的權力轉移而緊繃，更讓兩人各自背後的更大範圍的黨與政府系統之間的互動，有得以穩健運轉的前提。[109]

---

107 鄧林：「父親這個人不愛串門，人家不來，他也不去。我記得過春節的時候，二野的部下來看父親，父親跟他們坐在那兒，說幾句不打緊的話。不到十分鐘，父親就說：好嘛！就這樣吧。別人知道他這個習慣，後來慢慢也就都不來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頁229。

108 中國大陸一名相關的研究者提供的訊息(丁君)。

109 1980年代初期，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與政府總理趙紫陽之間的職權關係，可類比、相近於「文革」前鄧小平與周恩來之間的職權關係。胡、趙之間曾因經濟事務管理權限問題出現爭論，甚至讓外界有黨、政調子不一的觀感。如此迫使鄧小平出面對兩人進行仲裁。鄧以其早年擔任過中央總書記的經驗指示：胡與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雖「是要管經濟的，但主要是管大

然而，此一時期周、鄧之間彼此無爭、一心向主(毛澤東)的關係，也有一要而不顯的歷史負面作用：周恩來與鄧小平不但專心聽命於毛澤東而不敢造次，兩人還絞盡腦汁共同商議如何統整黨政機器，將毛荒腔走板的重大決策如「大躍進」付諸實施。該運動失敗後，周、鄧兩人還分別從黨與政兩方面檢討，爲運動之始作俑者毛卸責。周鄧關係在此時期雖契合，但在應對政治上愈益走偏的毛時，卻無嘗試合力對之從事任何形式的牽制。毛在鑄下餓死數以千萬計之農民的大錯後，威望不降反升，後來竟能任自發動「文革」，進一步地對中國大陸甚至中共政權造成極大的傷害。周與鄧(當然還有其他領導人)對毛的一再遷就，實難辭其咎。

六、「文革」時期之周鄧關係(1966-1976)

「文革」開始後不久，鄧小平被指控爲「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中央總書記一職不再被提起，在新的中央領導組成中，實際上也「靠邊站」，其後甚至受到所謂「造反派」的衝擊，在「保護」爲由下，鄧更喪失了人身自由。周恩來則在中共高層「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後，除繼續肩挑政府的工作，也接替鄧小平主持黨的中央日常工作，並力求在「文革」風暴中「積極地保持晚節」。[110]

在「鄧下周留」後，周恩來與鄧小平的關係也步入另一階段。然而，周、鄧兩人在「文革」前的互動關係與往來經驗，對「文革」期間的兩人關係以至於中共政治發展與演變，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周恩來與鄧小平在「文革」前的往來、特別是總理與中央總書記之間協作呼應的過程與經驗，讓周恩來更深刻地見識鄧小平所具之「治大國如烹小鮮」的領導特質與化繁爲簡、直指問題核心的能力。「文革」中，周恩來在批鄧賣力的康生面前，還曾不忌

政方針，不要干預具體的經濟工作」。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臺北：時報文化，2009)，頁145-149。在「文革」前鄧、周之間的工作相處中，目前則無資料顯示兩人曾發生類似胡、趙這種工作衝突、甚至要上位者協調的尷尬情況。

110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頁290。

諱地稱讚「小平同志看問題尖銳」。[111]再加上鄧小平在年齡上享有的優勢(鄧較毛澤東年輕 11 歲、較周恩來小 6 歲)，周恩來認爲鄧必是一未來可堪負黨國重責大任者。

對於鄧小平的政治倒台，周恩來應是甚感惋惜。事實上，在「文革」前夜，毛澤東因對鄧小平不滿而曾提議在鄧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之外另設一書記處，周恩來就婉言反對。[112]運動開始後，鄧小平處於被批鬥的地位時，周恩來對之進行面對面的批判，也是僅重述鄧自己所做的自我批評的主要內容；[113]周恩來在「文革」初期會見到訪的越南領導人時指出：鄧小平與劉少奇雖「犯了路線錯誤」，但周強調：「犯路線錯誤不是反黨，我們還是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希望他們改正錯誤，我們幫助他們改。」[114]

「文革」期間，毛澤東幾次堅持要將劉少奇與鄧小平「區別對待」，強調其「問題性質」不同。對此，深謀遠慮的周恩來，不可能不知鄧小平在毛澤東未來用人上所可能扮演的「伏筆」角色。因此，周恩來在對劉、鄧一併進行「大批判」時，還是有輕重區分，亦即將劉當作「主犯」，把鄧當作「從犯」。例如：1967 年 2 月 1 日，周恩來在批判劉、鄧的組織問題錯誤時表示：中共黨史上的「壞人」皆用人唯私，「劉、鄧也是這樣，特別是劉，帶有宗派性。」[115]同年 4 月 12 日，周恩來向來訪的范文同、武元甲介紹、說明劉、

---

111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頁221-222。

112 根據楊尚昆的回憶：「他(毛澤東)不是那個時候對小平同志有意見嗎，說小平同志封鎖他嘛。……後來『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另外搞個計委，另外搞個書記處。計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還有林乎加他們調來，把李富春架空。……當他提出另外一個書記處的時候，當然鄧小平同志不好講話。周總理就講，這個恐怕不好吧。」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頁36。

113 周恩來表示：「小平同志對於近十年來辜負主席和全黨的信任和期望，距離毛澤東思想日遠，甚至格格不入，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日久，思想作風日益退化，把書記處形成獨立王國，以至黨中央各部委沒有一個不發生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沒有做更深刻的揭發，在檢討中又還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緒，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66年10月。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57。

114 周恩來會見越南領導人黎筍的談話，1966年11月9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60-161。

115 〈重要匪酋對鄧匪的有關講話〉，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匪酋鄧小平資料專輯》(臺北，

鄧在對外問題的錯誤時指出：「在國際關係問題上，劉少奇也犯了錯誤。雖然他在口頭上也反對大國、大黨政策，實際上，他實行的就是這種政策。」在劉的領導下，「鄧小平也是如此」。「他們不尊重兄弟黨間的平等關係」。[116]

周恩來在「文革」中最爲人所稱道的，即是其「大樹參天護英華」的事蹟，鄧小平即是其一重點護顧對象。鄧小平被打倒，周恩來無力扭轉，但是其對鄧小平被批鬥、下放，皆保持高度的關心，[117]並適時伸出援手；[118]對於針對鄧小平所做的大張旗鼓的「專案調查」，也消極以對，[119]有時更乾脆替鄧作證、澄清。周恩來盡其所能地減輕鄧小平在運動中所受的磨難。1972 年 11 月 18 日，尚滯於江西、資訊還不甚流通下的鄧小平，當論及「文革」中的周恩來時即表示：「總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幹部，包括軍隊的老同志，都是總理保護的。」[120]鄧小平在「文革」過後論及周恩來時也說：「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事實上，鄧小平正受惠於繼續在「文革」政治漩渦中拚搏的周恩來的保護。

對於鄧小平的重登政治舞臺，早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搭機出走、墜

1976)，頁62。

116 周恩來、陳毅與范文同、武元甲的談話，1967年4月12日。轉引自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278、281。

117 「文革」爆發之後，在中南海內甚至曾組織批鬥會，分別對鄧小平、劉少奇進行當面批判。周恩來在前一夜就分配其身邊工作人員到相關會場以觀察情況。周囑咐如有過激行為，立即向之報告。會後，秘書向周報告有關批鬥會的情況，周「聽後很沉悶」。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00。1967年1月8日，周恩來在接見石油系統造反派代表時，當後者呼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時，周立即背過身去，以示抗議。然後表示：「他們兩位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鬥的辦法。」同年6月中旬至8月5日，特定群眾組織圍困中南海超過50天，企圖揪鬥劉少奇、鄧小平與陶鑄。周恩來堅持不撤出中南海易地辦公。周恩來後來在一次國務院業務組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如果我離開中南海，造反派就會衝進來抓人，那全國還有什麼地方不可以衝擊？如果劉、鄧、陶被揪走，那全國還有什麼人不可以揪？」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18-20。

118 1969年初，鄧小平被「戰備疏散」到江西，周恩來致電該省負責人，對鄧小平的安排做出具體指示。周否定江西省委所提出將鄧安置於贛州的方案，提出在省會南昌市郊，更對鄧的生活條件與勞動內容，予以細節的指示。

119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臺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頁76-77。

120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233。

毀外蒙以前，周恩來就有所期待。[121]「林彪事件」以後，當毛澤東意有所指地在公眾面前表示鄧小平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立即心領神會，馬上從各方面推動鄧小平的復出，除當眾爲鄧小平的問題進行說明外，也贊同其他老幹部向毛澤東寫信建議。[122]在毛澤東許可的前提下，幾經周恩來的運作與疏通，鄧小平終能在 1973 年春「東山再起」。向來不在身邊工作人員面前議論高層人事的周恩來，竟然罕見地於 1972 年冬在中共中央正式公佈相關決定之前，主動向醫生透露。[123]由此，可見周恩來對鄧小平能夠再度視事的由衷高興。周恩來也巧妙地安排初返政壇的鄧小平，出席雲集外賓的外交場合，[124]讓國際知曉中共政治的此一新動態。

周恩來喜聞樂見鄧小平重返政治核心，其既有出於惜才考慮、知曉鄧小平是一治政能人的緣故，更有了解鄧小平政治傾向的原因，這又與兩人在「文革」前那段密切工作、緊湊相處的經驗有關。鄧小平在「文革」前之政治思維與舉止，有「由左至右」、「從虛到實」的變化軌跡；周恩來則多懷以執中、不躁的立場。周、鄧兩人愈到「文革」前夕，政治主張、觀點的趨向愈是雷

---

121 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曾跟其保健醫生表示：「我告訴你，鄧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來，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來的，現在看來又不行了。」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233。

122 1972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接見訪客時表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205-206。1972年春，王震欲向毛澤東寫信建議讓鄧小平復出工作，請示周恩來，周示意可行。王震表示：「此事請示過周總理，總理說可以給毛主席寫信。」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42-43。

123 1972年冬，在中共中央尚未公佈鄧小平「解放」之前，周恩來主動向其醫生表示：「給你們帶來一個好消息」；周更高興地指出：此事能成，「不容易呀！」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頁274-275。

124 此場合為慶祝當時流亡中國的柬埔寨親王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成功回柬國視察的宴會。據西氏回憶：周恩來向他與在場的中外賓客介紹鄧小平「如何忠於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以及他在長期的中國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在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中的豐功偉蹟」。周更表示：「鄧小平下台是不公正的。不過，我們每個人有時也會遇到不幸，會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現在，小平同志已得到平反，恢復了名譽。」諾羅敦．西哈努克，〈中華民族永垂不朽的英雄〉，收入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頁275-276。

同，更多的是不謀而合、相互證成。其間，雙方所養成的信任，恐甚至是超越各自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這正表現於雙方在歷經「文革」劫難近 7 年後，再度重逢時彼此的坦承相對。

1973 年 4 月，甫復出的鄧小平與卓琳，看望人在玉泉山休養的周恩來與鄧穎超，兩對夫婦「見面時親熱得不知怎麼好了」。[125]值得注意的是，從政一貫唯謹慎的周恩來，在這次談話中竟直接對久違不見、數年未深談的鄧小平表示：「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我們調查他。」[126]以斯時張春橋在政治上所受毛澤東之器重，周恩來此舉無疑是冒極大的政治風險。周恩來之所以如此敢與鄧小平交心，除基於「文革」前其與鄧小平在往來中所涓滴積聚而成的政治情誼與默契，也是出於其在「文革」前同鄧小平工作中所注意到後者愈益務實成熟的政治判斷與智慧。顯然，周恩來深信被迫謫居數載的鄧小平，自始至此仍不會真心認同「文革」的政治理念、主張以及相關擁護者。從鄧小平後來「一朝權來手」，就大刀闊斧地針對過「左」所造成的問題與現象進行「全面整頓」來看，周恩來也確實沒有所信非人。

周、鄧此次涉及張春橋問題的深談，事實上，也預示了其後周鄧關係的發展，雖仍主要受制於毛澤東因素，但是兩人在互動時也須將那些與毛關係匪淺、利用「文革」起家的政治人物納入考量。進一步地說，毛的「枕邊人」江青與以「文革」理論家著稱的張春橋，即是對「文革」中之周鄧關係有所影響的「第三者因素」，而他們對於周鄧關係的進展，顯然帶來的是加溫的作用。

因爲有病在身的周恩來，可能已經在物色未來能接替他在林彪折戟沉沙後所實質享有之中共黨內的第二號權位。江青志大才疏，毛對此也明瞭，周不甚擔心。但是毛對張春橋甚爲欣賞，認爲張在理論的建樹與闡釋上，得其真傳，也希望張在未來在政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毛反對調查張的歷史問

---

125 張佐良，〈寧可貽誤治癌時機，絕不鬆怠為國操勞〉，收入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頁631。

126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262。

題以保護之，就是一例證。周雖知毛與其一樣對鄧器重，但難保也爲毛所愛的張將來不會半路殺出壓鄧而上，後來大量的例子也顯示張、江確有此心。如何爲鄧開闢、奠立其在周後的黨內地位而不爲張、江所取代、甚至減少毛對鄧的人事案心生反悔的可能，不但是周經營這段周鄧關係的主線，更成爲周晚年自認是其個人最重要的政治使命。獲周庇應以甩開江、張等人在政治上對之的窮追不捨，並專榮固寵於毛，也是鄧費心、珍重此一時期周鄧關係的主要動力。

生性多疑的毛澤東對於周、鄧相近並非沒有疑慮，他甚至曾試圖離間二人關係。1973 年底，周恩來與美國季辛吉談判，因爲超出授權範圍與未能及時通報，毛澤東小題大作地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周嚴加批判(此一批周會議與指控周在 1930 年代曾脫黨的「伍豪事件」，成為周恩來晚年兩大心病)。會場上對周的批鬥極爲猛烈，對他指名道姓斥責者不在少數，甚至有人威嚇向之取命。[127]毛澤東示意鄧小平到場與會，要其對此表態，藉以證明對毛之忠心並疏遠與周之關係。

懂得毛內心所想的鄧小平，識時務地不辜「聖上」所望，言簡意賅地對周恩來表示：「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128]在聞知鄧小平就周恩來問題發言後，毛澤東龍心大悅，甚至要即刻召見鄧當面嘉獎。在毛達到要鄧批周的目的後，對周大張旗鼓的批判旋即鳴金收兵。經過毛此番政治考驗的鄧，地位再次揚升，真正地重返權力核心。對於自認對毛、對黨無

---

127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戊君)。

128 高文謙對紀登奎的訪談。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472。對於高文謙以「昧著良心」形容、評論鄧小平對周恩來所做的相關發言，作者認為：鄧小平熟知毛澤東這種觀察他人如何應對其所撻伐對象，以辨明對己是否忠心的手法；而求取政治生存與立足，又是當時初返政壇的鄧小平的首要之務，其重要性自高於保存自我良心、顧惜戰友情誼。此外，周恩來長年以來、特別是「文革」爆發後，在政治上也每以毛澤東的好惡，轉換其自身對他人(自然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態度，鄧後來即不乏貶意地說周在「文革」中曾言「不少違心的話」、行「不少違心的事」。鄧小平在1973年批周問題上表態，除了政治權宜之計，恐也不能完全排除一可能性：其多少想藉機讓周本人有限度地親身領略萬夫所指、不論是非的「文革」式政治批鬥，而鄧此前數載即飽受此種磨難與痛楚。

比忠誠、鞠躬盡瘁的周恩來，聽聞鄧小平對之警以不要奪權的「提醒」，恐不甚好受，但是不論是周或鄧，也未嘗不知這是毛意在分化他倆的設想。後來的發展證明，政治局批周會議的此一插曲，並未爲之後的周鄧關係留下什麼陰影。

周恩來從識薦人才的需要上出發，也從政治傾向的趨近性度量，明白、屬意鄧小平是已飽受「文革」惡浪衝擊的黨國所亟需的幹將。周恩來因此不惜將自己的健康拋諸腦後，一再地爲鄧小平在強敵環伺下的政治生存與地位開道、護航。爲了讓剛返政壇而對情勢難免生疏的鄧小平儘快適應狀況，周恩來主動延後入院醫療時間。1974 年春，爲了讓鄧小平能順利率團代表出席聯合國會議，以增進其國內、外政治聲望，周恩來拒絕及早手術治療的建議，[129]更召集有關部門，親自主持討論鄧小平出訪迎送禮儀和飛行安全的問題，周表示要爲鄧「圓滿完成任務打通道路，爲他鋪上紅地毯」。[130]同年年底，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與毛澤東議談，其一重要動機就是爲了鞏固、確認鄧小平在黨、政、軍的職位。1975 年夏，周恩來在病榻上不顧身體之孱弱，親筆寫信向毛澤東舉薦鄧小平代替其所任之黨國職務(亦即黨第一副主席與政府總理)，只是未獲毛澤東的回應。[131]同年 9 月 20 日，周恩來在被推進病房接受手術前，還特意留步在張春橋等其他中共要人面前對鄧小平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

---

129 1974年3月以來，周恩來因癌症復發每日失血達100多毫升。然而，3月8日，周在審閱醫療組《檢查治療方案》時卻表示：根據目前情況，對方案所提切除手術一事，「此次不予考慮」，「以後再慮」。就學者分析，周所指「目前情況」，即包括斯時尚待研議的由誰領團代表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的問題。由於該會議的能見度與重要性，出席人選必將成為國內、國際關注的焦點，因此其之擇定，洞見觀瞻、影響甚巨。周恩來即時擁護毛澤東所提的由鄧小平率團出席的建議，致使江青欲杯葛而未果。安建設，〈最後的使命—周恩來與四屆人大〉，收入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周恩來百週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333。由於擔憂長期離開政治的鄧小平一時未能進入狀況，而遭政敵借機做文章攻擊，周恩來不惜拖兩個多月，直至6月1日才住入醫院進行手術治療。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頁277。

130 張瑞靄，〈一個老民航對周總理的懷念〉，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頁331-332。

131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頁142。

比我強得多。」以表達其對鄧小平相關整頓經濟措施的肯定與支持。[132]鄧小平後來回憶此事表示：「總理講的是心裡話，也是講給『四人幫』聽的。」[133]

這段期間，鄧小平也曾反向奧援周恩來。1975 年春，鄧小平對於「四人幫」以「反經驗主義」爲名對周恩來進行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的攻擊之舉，予以抵制並表示「這是在政治局內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134]鄧小平或也慮及不久人世的周恩來身故後鄧穎超的出路問題，不顧周的反對，提議鄧穎超出任人大常委副委員長。[135]

鄧小平的政治地位，雖然在政敵頻頻干擾下屢生風波，但多化險爲夷，甚至一度看穩。捨命相陪的周恩來，感到大任有所寄託而甚感欣慰，其對外或私下皆曾表露如此的心跡。[136]鄧小平也經常赴醫院看望周恩來，既敘病情，

---

1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721。

1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上冊，頁102。

134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174-176。

135 1975年10月21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其中提及人大常委副委員長補選一事，其表示：「穎超同志任副委員長，是劍英、春橋、先念、東興同志和我先商議並提到政治局會議的，大家都認為這樣安排是恰當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121。鄧小平與鄧穎超晚年也曾一起論及周恩來限制其伴侶任職的往事。1982年4月，鄧穎超在與周恩來胞弟周同宇及其子女見面時曾略帶抱怨地表示：「我做了名夫之妻，你們伯伯是一直壓我的。他死後我才知道，人家要提我做副委員長，他堅決反對。後來小平同志告訴我，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對。」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頁417。

136 1975年8月，周恩來接見柬埔寨外賓時，稱讚鄧小平並表示有鄧代替他，讓之感到安心。〈訪秀蒲拉西—中國有周恩來是幸運的〉，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頁359。1975年9月7日，周恩來生前最後一次見外賓。周恩來對到醫院拜訪的羅馬尼亞共黨人士表示其已收到「馬克思的請帖」，不能再工作了。周強調：「鄧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719-720。1975月7月下旬，周恩來至北海公園「仿膳」，該餐廳負責人請周保重健康，周表示：「主席健在，小平同志出來了，這就好哇。」龐長虹，〈周總理與仿膳飯莊二三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周恩來與北京》，頁203-204。萬里也回憶，其曾在北海遇到周恩來並表達對情勢的擔心，周表示：「不要緊，還有小平同志在嘛，沒有關係。」，收入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頁8。

也談工作，兩人保持音訊、意見上的暢通。[137]

迴異於主張「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堅持政治純潔與正確的「文革」激進派，周恩來與鄧小平同樣出於對政爭不斷的厭煩以及對於經濟建設的迫切，儼然形成統一戰線。例如：兩人共商送交 1975 年 1 月第四屆人大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不顧「四人幫」的阻撓，確定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爲報告中經濟部分的主題。周、鄧兩人自也成爲「四人幫」欲去之而後快的目標。1979 年 9 月 25 日，鄧小平在接見加拿大外賓時曾簡要回顧周恩來與他在「文革」後期的困難情況：

> 那時我剛出來工作，當時毛主席已經高齡，周總理擔負了全部工作，所以「四人幫」把矛頭對準了他。他們千方百計地破壞他的計畫，破壞他的政策，千方百計地污蔑他、打擊他。周總理工作累得很，是累病了。他得了癌症，又因為勞累，他的健康很快惡化了。1974 年到 1975 年，我實際掌管了全部工作，因此我又成了「四人幫」的主要障礙。他們集中力量打擊我，一年左右我就被他們搞下去了。[138]

然而，在此過程中，如何與「四人幫」、「眼鏡幫」周旋、以至於抗衡的問題上，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因各自不同的政治性格，而對應採的策略有相異的看法。鄧小平或自認擇善固執，其直來直往、單刀直入的政治風格，乃人所周知。周恩來過去就特別注意到「文革」前鄧小平與毛澤東重要文膽陳伯達之間生硬而帶有摩擦的互動情形。[139]鄧的這種強硬作風，並未因其曾受「文革」打擊而稍加收斂，在面對「四人幫」對之的刁難、纏鬥，或出於嫉惡如仇的義憤，鄧小平往往採取硬碰硬正面衝撞的方式回應，甚至揚言不怕

---

137 據周恩來警衛的回憶：「鄧小平經常來醫院看望總理，也談工作。總理病情不好時，他很快就趕到醫院。小平同志很注意總理的身體狀況，每次談話都控制在半小時左右。這裏有一組數字：小平同志在總理一年零七個月的住院期間，來醫院63次，如果減去每次大手術的10天時間不便探視外，平均每6、7天就來醫院一次。當總理癌症轉移，已無治癒的可能時，他明確指示：減少痛苦，延長生命。」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頁180-181。

1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559。

139 周恩來曾批評陳伯達「特點是欺軟怕硬」，「靠劉(少奇)怕鄧(小平)」。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03。

第二次被打倒。

周恩來則向以隱忍順守、觀機而動的方式，對付向他撲來的政治敵手。周恩來能在詭譎的「文革」政治中屹立不搖，乃因其能洞悉毛澤東的意向，從對毛戮力一心、分憂解勞的過程中，建立後者對之的倚賴，周再從中施力將事態導向其所欲的方向發展。在縮減「文革」負面效應、將黨國導向正軌上，周恩來鴨子划水般地成功爭取到鄧小平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就是一明證。另外，由於周恩來一直身處於「文革」的政治生態，他較諸鄧小平更能認識到「四人幫」與毛澤東之間深層的關係：毛與「四人幫」不但意識形態傾向如出一轍，相關成員縱使表現得再不成器，毛都不忍與之切割。毛置信他們才是會衷心維護其一手發動的「文革」偉業，因爲他們靠此起家，命運與之相連。周恩來因而希望鄧小平在與「四人幫」對抗時，莫因幾次兩軍對陣告捷而掉以輕心，誤以爲毛澤東會聽任鄧恣意翻轉「文革」的政策、放任鄧對其妻子江青、姪子毛遠新和其他革命信徒施加攻擊而不管。

據鄧小平的家人透露，鄧在「文革」復出期間，曾與周恩來有過一次對話。鄧對周說：「你那時候不得不這樣做。不這樣，就不能保護這麼多老幹部。」鄧進而表示：「我的性格不同，我不會委曲求全。」[140]這既顯現兩人在交換相關意見時的坦白，也具體反映了彼此在處理、應對多變的情勢時，各自可能的回應模式。除了當面勸說，周恩來也要人傳話給鄧小平，不要太著急、注意相關策略問題。[141]

正是因爲周恩來對鞏固鄧小平政治地位的百般用心與卯足全力，因此，當周恩來聽聞鄧小平有失策略地以「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爲由，拒絕毛澤東要其主持制定一正面評價「文革」的決議的要求，周不禁有所氣惱，直問鄧「你就不能忍一忍？」[142]深諳毛澤東政治心思的周恩來，必然了解鄧小平此時的直率所要承受的政治代價與壓力。其特地找來鄧小

---

140 鄧樸方，〈二十世紀真正的知己〉，頁116。

141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己君)。

142 據周恩來副衛士長張樹迎回憶，周「是瞪著眼睛對小平同志說：你就不能忍一忍？」秦九鳳，〈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所想到的〉，《黨史博覽》，第12期(開封，2006)，頁12。

平，詢問其對政治主張的既有「態度會不會變」。周恩來在聽到鄧小平回以「永遠不會」的答覆後，表示「那我就放心了」。[143]約此前後，周恩來在惦記鄧小平時，也曾請醫生代表他前去看望鄧。[144]

當鄧小平開始身陷「反右傾翻案風」，周恩來也一臥不起，甚至不時陷入昏迷。對於鄧小平後續的政治處境，周恩來雖不明說，也仍掛心不已，其一旦清醒，即要旁人讀報。鄧穎超與其他身邊工作人員就分析周是想從中獲取有關鄧小平的資訊。[145]這實也是病危中的周恩來，唯一可做的事。對於毛澤東同意下而掀起的來勢洶洶的「批鄧」惡浪，周恩來縱使還能正常工作，恐也無力阻止，更何況是其已病入膏肓。未幾，周在抑鬱中撒手人寰，鄧小平也被指爲「還在走」的「走資派」，再次黯然去職。臺灣軍情單位在事發後不久即不失準確地判斷：「前咸認爲鄧匪復出，乃因周匪之卵翼保其過關，而今之失勢似又與毛酋宿怨或與其內部權力鬥爭有關。」[146]「文革」之中周、鄧之間志業相承的成敗，如同「文革」前周、鄧之間相對權力的消長，同樣都繫乎毛澤東個人的意念，亦即，擺脫不了毛澤東巨大的身影。

「文革」時期的周鄧關係，對中共黨史發展的影響與意義上，有一流行的觀點是：周恩來在鄧小平「文革」復出以前與期間，曾力能所及地對之加以照顧。以鄧後來在中共「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居的「領導核心」地位來看，其意義自是重大。然而，這需要作更細緻的分析。

對於毛澤東在「文革」中意欲鄧小平復出政治並重新委以重任，周樂觀其成，即便毛似又暗地重施以鄧代周的故技。鄧復出不久，即因周的拉攏，

---

14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409。

144 1975年冬，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後，有一次周恩來在輸血後，對在旁的醫生表示：「我很惦記鄧小平同志，你能否代表我去看看他？」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頁504。

145 1975年12月，周恩來已進入時而昏迷時而清醒的狀態，但每天清醒時仍很認真地聽報，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不可遺漏。12月12日，周在一次清醒後又要求聽讀報，鄧穎超與身邊工作人員就此分析：分析周有事掛心，欲從報紙中獲取想知資訊，最大的可能是對將來政治形勢的不放心，尤其擔心鄧小平能否順利主持工作。趙煒，《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頁267-268。

146 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匪酋鄧小平資料專輯》，頁1。

以及鄧自身與「文革」護衛者政治傾向的不對盤，周、鄧兩人出現合流之勢，罹患重症的周更將鄧視爲其職位接班者而履伸手相助。此時期周鄧關係之具體歷史影響有：首先，兩人協力抗衡「四人幫」，力阻後者掌握毛以下的政治主導權的企圖，從而避免政局進一步的失衡。在此過程中，眼看有鄧領頭衝刺、周出面善後，不滿於「文革」的勢力自然匯集兩人旗下。這段時間內所集結的對「文革」感到疏離以至反感的力量，在周亡故、鄧去職後，雖不得不暫時轉明爲暗，但已蔚然成形。華國鋒接毛澤東大位後，既要用之，也爲之所擾；鄧後來的再次復出，也與這股力量的支持分不開。其次，在周護衛與支持下，鄧開展經濟整頓工作，短時內即有顯著績效，不但令人耳目一新，更影響輿情並爭取民心。鄧在毛後時代成爲人心所望的政治人物，與他在「文革」中展露的身手與不俗的表現有直接相關。事實上，此也作爲鄧後來改革作爲的先聲與預演。

七、結論

此節首先將前文針對中共建政後周鄧關係的論證結果，作一扼要的整理；其次，將針對本文之研究視角的意義與發展性，加以簡要的討論。

一、在毛澤東主政時期，由於毛在中共政治中居於獨霸、宰制地位的政治現實，其他領導人在彼此發展關係與互相往來的過程，勢必留心毛的有關意向並力求在其許可的界線內(無論是毛曾有明確表示，或是他們所猜想、以為的毛內心的可能想法)小心地進行互動。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的關係自不例外。當然，這並不表示周、鄧在經營兩人關係時全無任何可自主裁定的餘地以及懷有其他可能的考慮。只不過，兩人經營關係的自主空間與其他設想，都得框限在生性猜忌與多疑的毛之巨大而幽暗的身影下。

中共建政初年，周恩來、鄧小平在政治上屬於前輩、後進之間的關係明確，兩人也攜手歷經「高饒事件」風波的考驗。1950 年代中後期，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在二人經濟發展戰略分歧上表露無遺，毛甚而舉用鄧小平行使部份原由周主掌的大權(經濟)。在毛主導下的黨政關係新安排—鄧統領的中

央書記處指揮周領導的政府系統，周、鄧之間的權力關係實際上呈現上下顛倒、主次易位的局面，也就是變成鄧部署指導、周受命執行的工作關係。在此一新職權格局下的周鄧關係，在兩者基於善意與有心的維持下，並無因彼此權力升降而出現敵意與不信任。相反地，周對鄧愛護倍增，鄧對周敬重如昔。周、鄧在「文革」前的這一時期的政策協作與政治運作中，鮮有嫌隙、順當平順，其有助於「文革」前中共高層政治的穩定與人事關係的平和。「文革」開始後，鄧遭毛指責並罷黜，其既爲毛所公然拋棄，周自不敢越雷池貿然繼續與之往來。林彪機毀人亡後，毛有意讓鄧復出重新視事，周自悉心配合。周、鄧在「文革」期間的這段政治關係，乃是周正、鄧副下的庇護與扈從關係。兩人齊力緩解「文革」運動的負面影響，也聯手對抗運動得益者對兩人不斷發起的政治進攻，並縮限其勢力的擴張。雖然周、鄧聚合的力量與政策導向，在毛反對態度明朗下只能敗退、隱藏，周也因病去世。然而，周、鄧在「文革」後期的政治嘗試與人脈集結，在毛後又重整再興，甚而主導政局。

二、學界對於中共早期黨史與政治史研究，特別是涉及高層政治與菁英關係，向來有一個以毛澤東爲中心、再向外擴散的傾向，亦即側重探討毛澤東與中共其他主要領導人的關係。例如：毛澤東分別與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人的關係。在專門研究後者的政治傳記中，相關傳主各自與毛的關係，直是其主要的內容。這確切反映了在「毛澤東掛帥」體制下爲毛所用則得道、爲毛所棄則消殞的政治現實。此一研究取向創造、累積了可觀的學術成果，也豐富了相關領域的知識與內容。

在賡續前述的基礎上，隨著近年來大量資料與文獻的面世，現已有一定的條件針對毛澤東以外的其他中共領袖彼此間的平行關係，進行爬梳與探究。他們個人從事政治活動的時間維度長、與同僚又是高深度地共處互動，再加上從比較的角度，也可齊觀不同的中共要人在「毛氏宮廷」中，如何各顯其能以及彼此共濟或競合。如此使得新的研究取向的嘗試，兼有可能性與必要性。

本文對中共建政後的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的研究，實如拋磚引玉。其他

類似的議題如：周、鄧各自與長期作爲中共「二把手」的劉少奇的關係；鄧與陳雲、彭真在「文革」前與「改革開放」後兩階段關係的綜覽與剖析。都有值得思索的意義與深掘的價值。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卷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3.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1967。
4. 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5. 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匪酋鄧小平資料專輯》，臺北，1976。
6.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毛澤東思想萬歲》，臺北，1974。
7. 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總第2015期(北京，1956.10)。
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二)回憶史料***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永遠的小平：卓琳等人訪談錄》，成都：四川

*** 中共官方對其原始檔案文件一向嚴加管制，造成相關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大人為限制與阻力。本文主題事涉中共歷史上形象較為正面的兩名領導人，而關乎其歷史評價、個人名譽的檔案資料，更為中共官方所明令設限、拒不開放。為了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相關資料的不足，以及盡可能地嘗試突破中共官方刻意阻礙相關研究進行的意圖，作者不得不偏重使用回憶史料。無可諱言地，回憶文獻確實存有「無從考稽」、可信度有待商榷等諸多問題。作者在使用相關回憶文獻時，力求行以批判性的引用，亦即特別關注：回憶者的身分與其和回憶對象之間的關係(本文多處引用的是與周恩來、鄧小平有近身利害關係者，作者承認與留心其回憶內容與立場所具的特定傾向性)；出版的背景與條件限制(作者雖多數引用中國大陸出版的回憶錄，也注意採用在海外出版的較能暢所欲言者的回憶錄，以求立場的多元與平衡，例如：毛澤東的「反叛的御醫」李志綏的回憶)。另外，作者在使用相關回憶文獻時，也注重其與相關歷史背景與氛圍之間的契合度，並將其與基於因果邏輯推論的「理據」相互參照。最後，作者也強調：本文倚重相關回憶資料所做出的若干論斷，自有其侷限性，有待日後各類相關文獻陸續面世後，再行進一步地檢驗以至修正。

人民出版社，2004。
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周恩來與北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6.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臺北：地球出版社，1993。
7.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臺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
8.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9. 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0. 王大明口述，汪文慶、劉一丁整理，〈牌友鄧小平〉，《百年潮》，第4期(北京，2009)，頁31-36。
11. 本書編委會編，《肝膽相照見真情——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民主人士的交往》，北京：中國文獻出版社，1999。
12. 朱仲麗，《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第3卷，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4。
13. 吳群敢，〈在西花廳周總理身邊工作〉，《中共黨史資料》，總第63期(北京，1997.09)，頁96-103。
14.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15.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1994。
16. 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7.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8. 周秉德，鐵竹偉執筆，《我的伯父周恩來》，香港：滿威利基金會，第五版，2007。
19. 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
20.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1.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2.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第3期(北京，2009)，頁29-36。
23. 郭思敏、天羽編，《我眼中的鄧小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24. 童小鵬，《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
25. 賀耀敏，〈鄧小平領導我們進行整頓和改革—訪袁寶華同志(上)〉，《百年潮》，第8期(北京，2004)，頁4-11。
26. 趙煒，冷風執筆，《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27. 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臺北：時報文化，2009。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修訂本，1997。

(三)研究專書

1.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8. 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9. 李天民，《評周恩來》，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
10. 林蘊暉，《國史劄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11. 馬永順，《周恩來組建與管理政府實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1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13.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14.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15. Bachman, David.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 Barnouin, Barbara and Yu Changgen. *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 Becker, Jasp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8.
18. Goldstein, Avery.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 Wilson, Dick. *Zhou Enlai*,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4.

(四)期刊論文

1. 李林，〈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7)，頁13-21。
2. 李海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來及職權〉，《黨史博覽》，第9期(開封，2006)，頁4-6。
3. 秦九鳳，〈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所想到的〉，《黨史博覽》，第12期(開封，2006)，頁11-16。
4. 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爲〉，《當代中國研究》，第93期(普林斯頓，2006.06)，頁94-105。
5. 鍾延麟，〈鄧小平在文革前中共與東南亞共黨之關係：角色和活動〉，《中國大陸研究》，第3期(2006.09)，頁143-169。
6. 鍾延麟，〈鄧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4期(臺北，2007.12)，頁87-116。
7. Teiwes, Frederick C. "Mao and His Lieutenant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20 (1988), 1-80.

(五)論文集論文

1. 石仲泉，〈周恩來——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又一歷史偉人〉，收入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周恩來百週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2. 安建設，〈最後的使命——周恩來與四屆人大〉，收入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周恩來百週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3. 李紅喜，〈十年總書記期間鄧小平的思想與實踐研究述評〉，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研究述評》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4. 龐松，〈1952-1956年鄧小平的工作、思想軌跡〉，收入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鄧小平百週年紀念——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6)

Chung, Yen-lin

Postdoctoral Fellow at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 between 1949 and 1976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litics because both Zhou and Deng were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figures who actively participat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cision-making and policy-implementing processes.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hou mainly acted as premier (head of the government) while Deng mainly served as the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in charge of the daily work of the Party on behalf of the Party center. How did these two crucial position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hen the CCP launch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58, the working relations and relative political power between Zhou and Deng underwent adjustmen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the Party takes command of the government," and to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se two institutions. Prior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hou and Deng had reached consensus ov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running of the party-state, and they not only cooperated well but also created much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 during political operations and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will show that the working experienc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that Zhou and Deng fostered during this time had much impact on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late Cultural Revolution. Zhou tried his best to support Deng, and they worked together to deal with the radicals. In addit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and Deng before an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uld not evade the influence of Mao Zedong.

Keywords: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Chinese Elite Politics